

期末考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何而来？特在何处？

特在何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体现了哪三个逻辑的统一？

如何正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

“八个明确”的基本问题和“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

为什么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从何而来？

如何科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

怎样理解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结合实际，请你谈一谈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

高质量发展带来什么新变化？

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十大策略

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主要制约有哪些？其举措？

四个重要特点

面临的主要制约

五大举措建议

如何理解评价政治制度民主性和有效性的八个标准，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

如何理解“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全过程的民主”

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如何理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如何进一步健全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

如何把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时代意义和创新价值

习近平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思想探析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哪些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哪些方面则集中暴露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在充分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如何准确把握习近平强军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创立形成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历史维度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要义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时代内涵

如何理解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核心要义和重要地位

重要地位

习主席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请你谈谈对这一论断的认识

如何正确理解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以及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如何认识人民军队在新冠“总体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

周力：必须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中国因素和世界因素统筹起来考虑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为什么要有效衔接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基础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如何看待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深刻内涵？

十八大以来我国就业新特点和就业优先战略新内涵

创新型国家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

香港极端势力的表现、影响与原因

美丽中国应该如何建设？

“十三五”时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哪些决定性成就？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哪些深刻复杂变化？

为什么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如何理解“十四五”时期要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怎样理解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如何理解“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

怎样理解“十四五”时期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如何理解“十四五”时期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为什么必须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原则？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为什么必须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为什么必须遵循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原则？](#)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为什么必须遵循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原则？](#)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为什么必须遵循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
[如何理解“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
[如何理解“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为什么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如何理解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
[怎样理解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怎样理解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为什么要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
[为什么要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
[如何理解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
[怎样理解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
[如何理解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如何理解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
[怎样理解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
[为什么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如何理解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为什么要发展数字经济？](#)
[为什么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
[如何理解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怎样理解畅通国内大循环？](#)
[如何理解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
[怎样理解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如何理解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主要有哪些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何而来？特在何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拍脑袋臆想出来的。

是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传承下来的。“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构建，都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土壤。走向历史的深处，今天的很多制度都可以找到渊源。比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一统观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礼教制度，“代天巡狩、整肃纲纪”的巡察体系……在绵延不绝的中华历史中，古人以其智慧创造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资源，为今天完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镜鉴。

是从近代以来深重苦难中求索出来的。1840年以后，为挽民族于危亡，先进的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北洋水师的甲午惨败，深深地惊醒了国人，中国之败表面上是技不如人，根子上是制不如人。自此，中国走上了制度变革探索之路，先后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种种方案，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黑暗中彷徨无计的中国人找到了一种新的制度选择。

是从我们党近百年接续奋斗中创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在局部执政的革命根据地，对建立适合国情的社会制度进行积极探索，为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积累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制度探索之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经过从理论到实践的反复探索、历尽千辛万苦形成的，其过程无比艰辛，其成果无比辉煌。

特在何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中华民族5000多年、近代以来170多年历史，从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出发，深刻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主义。这些论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充分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它立论的科学基础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他回顾总结了社会主义500年从无到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外国到中国，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深刻阐述了党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深刻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质疑，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有人说是“资本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没有丢掉“老祖宗”。不仅如此，而且以一系列新的独创性的重要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老祖宗”，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不断建设相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国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底蕴指明了路径。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最先进的文化，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扎根，必然要贯穿如何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它作为一种前现代的文化，需要进行革新，社会主义恰好就是这样一种革新的力量；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如果不与中华文化相结合，不从中华文化中获取思想资源和支持，就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拒斥，在中国大地上就没有生长的根基。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自觉地坚持用社会主义革新传统文化，而且自觉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为社会主义文化注入丰厚滋养。这样，社会主义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紧结合和融合在一起，不仅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展现出旺盛生命力，也使中华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因此，宣传阐释中国特色，一定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有着深厚文化基础，从而大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和解释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总结了近代以来的历史，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充分的历史根据。

近代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我们党成立之初，经过反复比较和深刻思考，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90多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昭示未来方向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历经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没有改革开放前积累的重要思想、物质、制度条件，改革开放难以顺利推进。同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历史启迪现代，现代继往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其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指引下，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深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体现了哪三个逻辑的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九大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最深远的历史贡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意义深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什么、如何学、怎样践行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以下简称《三十讲》）全面、系统、深刻地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凸显了其鲜明的思想特色和理论品格，为全党全国学习领会践行这一思想提供了路径和抓手。学习《三十讲》，学精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需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贯通的历史逻辑。

首先，这种历史逻辑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理论和实践主题依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时强调指出，“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

其次，这种历史逻辑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历史维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四个走出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从改革开放回溯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溯到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华民族史，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

再次，这种历史逻辑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源泉，在价值立场、思维方法、理论旨归等各方面具有一致性，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主题主线。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根据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目标、发展任务等的新变化，讲出了新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清晰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既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各方面的基本问题，也包括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作出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概括起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展开。对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系统回答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干。

具体说来,“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八个明确”是支撑整个思想体系的四梁八柱,完整且配套。“十四个坚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和“方法论”。从理论内容上看,“八个明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偏重于新时代条件下理论层面的概括和凝练,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今时代的理论思考和理论贡献。“十四个坚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涵盖对党的治国理政重大方针、原则的最新概括,偏重于实践层面和方略层面的展开,体现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贯穿着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相互融合、有机统一,共同组成逻辑严密、内容完备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凝结着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拓展和升华。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的实践逻辑。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既准确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理论品格,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的原因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展现出强大的实践逻辑。

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之所以具有实践指导地位,是因为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人民至上论”、“人民幸福论”。这一思想彰显了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是写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科学理论。

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的高度统一。一个具有强大实践逻辑的科学理论体系,必然具有明确的目标任务规划,并且能够提出达成目标、完成任务、实现规划的部署和举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眼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聚焦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划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使目标更为具体明确,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总抓手,使各项战略举措能够相互衔接、有机联系,提升了实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必须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总体目标,作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更丰富、要求也更高了。

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的高度统一,不仅实现了顶层设计和具体规划的有机统一,而且实现了工作部署和具体抓手的有机统一、聚焦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将宏大的目标落细、落小,将繁杂的任务落地、落实,将强弱项补短板作为解决问题、完成目标的突破口。

再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明了达成目标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战略定力、问题导向、全面协调、底线思维、调查研究、抓铁有痕、历史担当等,这些都体现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现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既是世界观、历史观,也是认识论、方法论;既讲是什么、怎么看,又讲怎么办、怎么干,体现了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高度统一。

如何正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

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体系,主要看是否包含鲜明的主题,是否系统回答所处时代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完整的结构并且不断开放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这样一个集时代性、系统性、原创性于一体的开放的科学体系。

(一) 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一个政党在一个时期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一代领导人在一个阶段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都是由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始终聚焦于回答重大的时代课题,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时代课题无不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关乎中国去往哪里、走向何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影响时代发展的基本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无疑是新时代的新课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新时代,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向世界再次昭告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立场,为新时代的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深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深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是什么”。进一步亮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政治立场,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深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在哪里”。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作出了阐释,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显著优势,强调这些显著优势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深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进一步强调必须接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篇章,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半程的历史探索,不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进。

(二) 形成了一个系统完备、相互贯通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主题目标,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等结合上对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全方位、立体化回答,在各领域、各方面都形成系统化的思想观点,是一个内涵丰富、系统完备、相互贯通、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用“八

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概括了这一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理论自觉到实践自觉的全方位思考。“八个明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主要从理论层面回答了建设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十四个坚持”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主要从实践层面回答了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换句话说，“八个明确”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十四个坚持”则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一个是支撑整个思想体系的“四梁八柱”，一个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和“方法论”。两者相互融合、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体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系统完备的。这一思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领域，包括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作出的全面深入阐述，也包括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作出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相互贯通的。“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既提出了认识世界与分析问题的根本观点，又提供了解决问题与指导实践的科学方法，体现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贯通；既关注时代发展脉搏，又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与期待，体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贯通；既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又以创新理论指导着新的实践，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贯通；既着眼于对全局性、长远性、整体性重大问题的谋划，又关注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和实践过程，体现了战略与战术的贯通；既强调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又提出宏伟奋斗目标，体现了问题意识与目标导向的贯通；既关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又强调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贯通。

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归纳和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突出、一以贯之的主题，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是科学理论体系的“纲”和“魂”，能将科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有效统摄起来、有力凝聚起来，发挥提纲挈领、凝神聚气的关键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是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论断、重要思想。比如，用“中国梦”形象生动地表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作出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描绘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坚守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认识成果、最根本的规律总结；强调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强调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等等。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系统的内容体系，即“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概括和战略指引，其主体内容体系可概括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八个明确”偏重于理论层面的高度概括和凝练，集中反映着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时代的理论思考和理论贡献。“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偏重于实践层面、方略层面的展开，涵盖坚持党的领导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涵盖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对外战略，涵盖此前提出的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是对党的治国理政重大方针、原则的最新概括，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要求。“八个明确”与“十四个坚持”有机融合、有机统一，凝结着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凝结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拓展、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四梁八柱”，有力撑起了整个体系的宏伟大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凸显了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即“八个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又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方法论，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概括为“八个坚持”，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全面协调、坚持底线思维、坚持调查研究、坚持抓铁有痕、坚持历史担当。这“八个坚持”紧密联系、环环相扣，既有观大势、揽全局的战略视野，又有强化问题意识的现实导向；既强调统筹协调、谋定后动，又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既是世界观、历史观，又是认识论、方法论；既讲是什么、怎么看，又讲怎么办、怎么干；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指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严整的思维逻辑体系，即包括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在内的“六大思维”。战略思维，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历史思维，就是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辩证思维，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创新思维，就是破除迷信、超越常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法治思维，就是增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底线思维，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六大思维”把握事物普遍联系、矛盾运动、永恒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理性思维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科学运用和创新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是指导我们党治国理政、执政兴国的科学理论体系。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条件下创立并不断发展的，也正是由于这一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开启和引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蓝图，又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明确了“路线图”、“时间表”；既从宏观上擘画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又从中观、微观层面对实现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进行周密部署，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战略和战术相一致、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思想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有机统一，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和人民领袖的强大人格魅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博大精深，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是内容严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鲜明话语风格，形成了一整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解渴管用、入耳入脑入心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讲了很多新话；既包含众多文辞典雅、含义深邃的中外典故、格言、警句，又包含诸多形象生动、“接地气”的群众语言；既贯穿条分缕析、丝丝入扣的理论阐释，又适时插入扣人心弦、使人喜闻乐见的故事、场景；既高屋建瓴地总结成功经验、高瞻远瞩地指明前进方向，又入木三分地为突出问题和消极现象“画像”、一针见血地“问诊”、“开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和“彻底”、“掌握群众”的优良文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光辉典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贯通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不动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聚焦新时代命题，凝结新时代精华，总结开创性、独创性的实践经验，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许多重大论断和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建设路径，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八个明确”的基本问题和“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

“八个明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核心关键的组成部分。它具体阐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四个自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新时代强军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党的领导及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等问题。“八个明确”提纲挈领地指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构成了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体系。

“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这一思想的实践要求。基本方略是一个思想张力和理论概括力都更强的概念，它全面涵盖党的战略策略等行动纲领层面。“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是对党的治国理政重大方针、原则的最新概括，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战略与战术相结合，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方法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精辟概括的“八个明确”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之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八个明确”：第一，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第四，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六，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第七，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八，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为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基本方略共**十四条**：第一条，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讲的是领导力量问题；第二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讲的是政治立场问题；第三条，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讲的是发展动力问题；第四条，坚持新发展理念，讲的是发展导向问题；第五条，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讲的是依靠力量问题；第六条，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讲的是法治保障问题；第七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讲的是精神力量问题；第八条，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讲的是发展目的问题；第九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讲的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第十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讲的是国家安全问题；第十一条，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讲的是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第十二条，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讲的是国家统一问题；第十三条，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的是中国和世界关系问题；第十四条，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讲的是党的自身建设问题。

这十四条，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归纳为“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正因为这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两个涵盖：一是涵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涵盖“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涵盖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对外战略等党的方针政策；二是涵盖此前提出的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主要内容。

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主题、根本立场、根本要求

要从总体上、系统上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需要对贯穿其中的根本主题、根本立场、根本要求准确把握。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喻成写一篇文章，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串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

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以人民为中心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2012年的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作为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和中外记者见面，做了很简短的演讲。这段讲话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责任”，讲了三种责任——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人民”，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直抵人心的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开篇就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要求。无论哪个领域、哪方面工作，无一不是从加强党的领导抓起，最终落脚在强化党的建设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情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对于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前进方向、凝聚奋进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为什么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地位的一个科学界定，也是我们党第一次以“世纪”为尺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一)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以其真理的力量跨越地理边界和时代隔阂，传遍五洲四海并不断与时俱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深度参与了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深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不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都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载入人类思想史册，都能够冠名“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称号。以“世纪”为尺度命名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理论研究对象是世界典型样本，二是理论成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三是理论实践成效深刻改变现实世界。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用以上三个条件来衡量，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可以称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为首创成果和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称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之所以称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在于：这一学说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典型样本——西欧样本，英国伦敦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这一学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第一次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全人类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这一学说的实践成效深刻改变了现实世界——作为一种革命理论和人类解放学说，指引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推动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为首创成果和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称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在于：其研究对象分别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样本——苏俄和中国，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地带；其理论成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们创立了适合各自国情又兼具普遍意义的民主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照亮了俄中两国的革命和发展道路；其理论实践成效深刻改变现实世界——它们指引俄中两国无产阶级各自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深刻改写了20世纪国际政治结构和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命运，深刻启迪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极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以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镌刻在世界思想理论版图的显著位置，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同样是与这一思想的研究对象、世界意义、实践成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时代，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标志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家地理边界而进一步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已经有资格成为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思想理论高地。

新时代是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时代，也应当是中国理论自立自强的时代；新时代是中国不断向世界舞台中央挺进的时代，也应当是中国理论超越地域性不断世界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国家还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今日的中国，经济上、物质上的强大正在成为现实，但这绝不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全部梦想，中国绝不能成为一个物质发达而理论贫困、学术不彰的“跛脚大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一个物质强大的中国，还必须是精神自立、文化自信、理论自觉的中国。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思想必须跟上物质的脚步，不能身体进入了新时代，登上了世界舞台，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止步于喑呀学语。如果物质的丰饶伴随着的是思想的贫困，经济的崛起伴随着的是精神的塌陷，体量的壮大伴随着的是文明的贫弱，那么这样的民族不可能赢得世人的崇敬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大国不可能屹立世界舞台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

今天，站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历史方位上，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在世界思想理论版图特别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版图中扮演什么样的理论角色，在捍卫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承担什么样的理论使命。尤其需要思考，我们在向世界注入强劲中国动力的同时是否贡献了引领人类精神的中国原则；我们在物质层面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同时是否在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作出了同等重要的贡献；我们的思想理论、学术地位如何更好地与我们的世界大国地位、文明古国身份相匹配；我们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更好地肩负起在21世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使命。

（三）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任何理论都钟情于伟大的实践样本，任何理论家都眷恋实践的热土，唯有伟大的实践才能孕育伟大的理论，才能孕育伟大的理论家。真正的理论家从来不会空中盖楼阁，伟大的理论总是背靠伟大的实践，以精深的思想表征时代、引领时代。

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故事发生在哪里，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转移到哪里，那里就是马克思主义最钟情的研究样本，那里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重镇，那个国家的共产党就是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先进政党，那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最新形态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

展望21世纪，我们有理由认为，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在中国，世界上最伟大的实践样本已经并将继续是中国样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完全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完全有理由冠名“世纪”的称号，称之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伟大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也一定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大繁荣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必将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注入强劲的创新动力和厚植丰腴的学术土壤。这确实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理论的时代，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伟大思想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在中华民族健步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重镇，伟大的中国样本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聚焦的基础样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和理论的大逻辑。

（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主要根据就在于符合前述的三个条件。

其一，这一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世界伟大样本——21世纪全球最伟大的中国样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前行，党和国家事业续写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书写了贡献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中国故事，中国已然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伟大样本。中国样本诞生于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环境中：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超长时间的历史纵深、超大幅员的国土面积、超大数量的人口规模、超常复杂的民族宗教结构、从未间断的文化血脉和文化传统。中国样本不同于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样本，西方学说解释不了中国奇迹；中国样本不同于以阿根廷、智利为代表的拉美样本，所谓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学说完全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样本不同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样本，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解释框架解释不了中国；中国样本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样本，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不能完全解释当今中国发生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正确解读中国奇迹、解码中国样本的唯一科学学说。

其二，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诸多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涵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一系列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思路，为迷茫困惑的世界破解了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造和思想贡献，让世界进一步知道了“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还让世界进一步知道了“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我们有理由坚信，具有世界意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定会在人类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一定会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三，这一思想的实践成效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从遭受严重挫折到正在逐渐走出低潮的曲折历程。曾几何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步入低谷，科学社会主义备受苛责，有人宣称“历史已经终结”，“20世纪将以社会主义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还有人断言社会主义中国也将随着“多米诺骨牌”效应而轰然倒下。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九曲、终向大海。历史从来不会屈从于西方的先验逻辑，总是按自己的定律向前演进；科学社会主义从来不会在喧嚣围剿中宣判失败，总是在实践中一次次展现出强大生命力，证明其真理性。“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功，谱写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来最精彩的华章，世界上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正在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变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能量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再度被激活。展望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决定性成就来雄辩地证明一个伟大结论——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五）

中国方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冠名“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件。所谓中国方案，是特指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而提出的中国主张或采取的中国行动。这里所说的中国方案，不是面向中国问题的方案，而是指向人类共同难题的方案。

今天，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与此相对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一，治理的中国方案。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存在各种不公平规则和制度缺陷，全球治理越位、治理缺位同时并存，治理赤字由来已久。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不符合全球正义的原则，没有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如何化解全球治理赤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主张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中国倡议的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典范，第一次为处于“地球边缘”的国家提供了公平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

第二，信任的中国方案。当今世界，人类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固守零和博弈思维，秉持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舍义取利，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被西方视作国际关系的通行法则，“本国优先”“本国第一”公然上升为个别西方大国的执政理念，以本国利益为轴心，任意退群、肆意毁约，罔顾全球公义，制造信任危机。如何化解全球信任赤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倡导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倡导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中国提出的正确义利观、信任观，是对西方利益观和丛林法则的超越，为世界各国相互信任、并肩前行，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正确遵循。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就是践行正确义利观的重要体现。

第三，和平的中国方案。西方主导的世界安全秩序固守排他性安全观，强调霸权有利于世界稳定，结盟才能带来绝对安全，强调西方大国没有责任保障盟友之外的国家安全。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但世界仍很不太平，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高悬在人类头上，和平赤字依然严峻。如何化解全球和平赤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实现了对西方结盟机制和冷战思维的超越；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实现了对西方排他性安全观的超越；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了对大国必战、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超越。

第四，发展的中国方案。长期以来，西方奉行线性发展、梯度进化的发展逻辑，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单线演变进程，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领制高点，发展中国家则长期固守低端，东西发展差距愈拉愈大。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如何化解全球发展赤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倡导“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为改写西方发展逻辑贡献了中国话语；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中国动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为消解全球发展赤字作出了中国贡献。

贯穿于这四大方案之中的轴心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他具象的中国方案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总方案。中国方案的提出，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重大。没有中国方案，中国理论就不能走出民族性的逼仄处境，上升为普遍性的世界理论，就难以冠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六）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留给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事业。进入新时代，中国已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高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光荣和崇高使命。同时必须清楚，中国绝不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阵地。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伟大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最伟大的推进者；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传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意义，但这并不排斥和影响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国实际出发在21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结束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供现成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胜利，要靠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了解各国情况，从本国实际出发解决各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事业是一张改天换地的蓝图，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历史不会终结。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态侧重于解决本民族的特殊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还侧重于解决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态，否定或贬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意义；也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态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否定或贬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成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主体、主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大家族，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总源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是一条主干线。此外，还存在若干条马克思主义的支流、支线。每一条线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各条线整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思想谱系和理论图景。正如19世纪、20世纪一样，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族宾朋满座的繁荣景象不会终结，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源多流的基本面貌不会改变。

发布时间: 19-06-2015:44央广网官方帐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绪论部分，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强调这一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只有深刻认识这一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才能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才能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的内生动力和行动自觉。

一、在勇于洞察时代中创立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所在。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再到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不都是顺应时代大势、解决时代问题、推动时代发展的理论结晶。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方位是新时代，逻辑起点也是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凝练地说，就是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新时代。从世情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十分紧迫地摆在了世人面前。从国情看，当今中国正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分紧迫地摆在了国人面前。从党情看，我们党管党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但“赶考”依然在路上，“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等，十分紧迫地摆在了全党面前。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不仅呈现出各自的特点，而且相互交织、叠加在一起，进一步增加了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

时代需要理论创新，但理论创新决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历史反复表明，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是一个十分艰苦的创造过程，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需要自我革命、不断超越的勇气，还需要统揽历史大势、破解时代难题的智慧。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

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了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有了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就贯穿着“革故鼎新、一往无前”“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也是在“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纲要》讲到，“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样的论述非常深刻、很有分量，充分阐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勇于洞察时代、勇挑理论创新重担的领袖气魄，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理论创新上的执着自信和历史担当。

二、在创造性回答时代之问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把握了时代问题，还要回答时代之问。这是理论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也是推进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典范，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就理论创新广度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贯通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这集中体现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之中。

就理论创新深度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具有开创性、原创性的。这种开创性、原创性，打破了惯常的视野局限、思维局限与理论局限，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进一步揭示、又有对当今时代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既有对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范畴的丰富、又有对一些重要思想观点内涵的拓展，既有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刻阐述、又有对重大实践问题的战略谋划，说出了很多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阐明了许多前人没有阐明的道理，在新时代给党和人民确立起新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比如，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个走出来”的重大论断，提出将“四个自信”扩展为“四个自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中国共产党既要勇于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又要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等等。所有这些，都彰显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机析理”的理论特质，真正使人做到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三、在引领时代发展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风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闪耀着理性光辉和人格光芒的科学理论，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风范。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科学性、人民性和实践性，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实质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有这样的特点。

第一，它是科学的理论。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主要看是否系统回答所处时代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完整的结构并保持开放性的特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系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性质是什么、特色在哪里、向何处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一思想主题鲜明突出，已形成集时代性、系统性、原创性于一体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第二，它是人民的理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鲜明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真理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正如《纲要》所讲：“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

第三，它是实践的理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为改变当代中国人民乃至人类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中国人民从富到强的实践中形成的。它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赋予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实践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创造性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它坚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实践观，强调担当作为、知行合一、干在实处，提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要保持艰苦奋斗、不懈奋斗、接续奋斗的精神状态，为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是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

归结起来说，就是《纲要》所讲，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从何而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成就、科学内涵、本质特征、显著优势，指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根本保证，让我们进一步坚定了制度自信。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从何而来？

一、坚定制度自信源于实践成就

清代思想家魏源说过：“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意思是说：鞋子不必相同，合脚就好；国家制度不必相同，利民就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我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和来源国。据世界银行测算，2012年至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4%，超过美国、日本、欧盟贡献之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我国社会长期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反观那些自认为其社会制度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西方大国，近年来却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政治极化严重、党派纷争不止、民粹主义高涨、种族歧视凸显、暴力事件频发、社会撕裂加剧、深陷治理困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有力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福祉，未来必将持续推动我国进步和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二、坚定制度自信来自优势积淀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自哪里？就来自我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

每一种国家政治制度都有不同的关注对象。在一些西方国家，执政者都来自某些利益集团并因这些集团的支持而上台，自然便是这些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所以，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集团的倾向性、片面性。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坚持人民立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西方国家的制度弊端，确保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始终得到全体人民的一致拥护，具有长期稳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制度，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正因为这样，全世界最大规模、最有成效的脱贫行动才会也只会在我国出现。70年来，我国有8亿多人口先后脱贫。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人口共减少9200多万，剩下的600多万人口今年将全部脱贫，联合国减贫目标绝大部分由我国完成。这是最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最大的仁政、最有力的人权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种举国体制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统一意志和动员力量，能够做到“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一致响应”，可以调动一切资源、形成最大合力，尽快办成大事。“两弹一星”、“南水北调”工程、三峡水利工程、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这些世界级奇迹以及各种重大应急救援事件特别是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出的“惊天”伟力，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有力证明。正因为有了这种特殊而宝贵的优势，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甚至数百年才能办完的“大事”。

三、坚定制度自信根植历史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每一种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都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基础之上。所以，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不能强行“引进”、生硬“移植”，必须得到这个国家和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和接纳，否则便会水土不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其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追求中和的政治境界等，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深得中国人民的深层次文化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不忘本来”又“吸收外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相互融合、相互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顺应规律自然生长的，最适合中国国情，最适应中国“水土”，最受中国人民拥护，必然能够行得通、走得远。这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文化依据。

四、坚定制度自信基于理论创新

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治国思想、治国理论的制度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伴随着我们党思想理论上的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进一步揭示、又有对当今时代问题的崭新认识，既有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刻阐述、又有对重大实践问题的战略谋划，说出了很多前人没有说出的“新话”，阐明了许多前人没有阐明的道理，不仅为我国走向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而且还为解决当今许多国际性问题、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由此可见，党的先进理论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理论底气。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成功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一定会伴随着我们党理论上的不断创新而日益完善定型。

如何科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具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以下七个方面：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这一条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经济体中，经济发展绝非单纯是一个经济现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统筹。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奥秘所在。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其发展将面临更多的矛盾和挑战，于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宝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实质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改革是培育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围绕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问题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改革，增强改革意识，提高改革行动能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我们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宏观调控既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作出的应对，也应当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引导。

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我们强调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出化解产能过剩，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等，都是针对一些牵动面广、耦合性强的深层次矛盾的。

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色彩和智慧色彩。在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下行态势的挑战面前，我们既不任其“自然下滑”，也不“以跳求进”，而是强调“稳中求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是“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的最好诠释。

怎样理解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既面临重大机遇，又面临诸多挑战。国内经济步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国际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凸显；世界性的贫富分化、环境破坏、资源约束等问题日益严峻，人类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与困境。这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国发展、世界发展、人类发展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回应“时代之问”的重大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其中，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发展立场、逻辑、路径和方法论的新时代发展观，既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又是推动中国与世界共荣、解决人类发展赤字的中国方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

当前，深入学习、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必须深入学习、理解和贯彻好新发展理念。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理念的逻辑机理和实现路径》（田学斌著）一书，就是紧扣发展的“时代之问”，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围绕新发展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深刻内涵、理论品格和实现路径所作的深入思考和阐释，书中的观点和见解，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问题意识、时代价值、世界意义和人类关怀，更好地凝聚起新时代发展共识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借鉴和实践参考价值。

新发展理念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也是新时代发展的核心要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新发展理念就是对破解新时代发展与需要之间的矛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这一新时代重大课题的回应，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也以此为主线而贯穿和展开。只有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才能顺利跨越发展关口，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发展理念是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中国与世界共生共荣的现实途径。新发展理念根植中国、面向世界，它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既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之道，又是针对世界经济问题开出的治本之策，更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秉持开放共享理念、推动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大国担当。当前世界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仍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国际贸易低迷、金融市场跌宕起伏等多重风险和挑战，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凸显出全球经济治理困境。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不仅以自身经济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活力，更通过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亚投行、“一带一路”建设等诸多努力及切实行动，为世界各国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发展机遇、分享发展红利，推动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出既发展自身又普惠世界的大国责任与世界胸怀。

新发展理念是突破西方发展模式困境、解决人类发展赤字的中国方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新发展理念的根立场、内在逻辑和价值导向。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而提出的实现人的解放和本性复归的重要命题，现实中这一问题并未解决并因资本主导发展的逻辑带来世界性的贫富差距、社会分化、环境恶化等对人的发展的诸多制约，这也是西方发展危机难以根除的深层原因。新发展理念立足超越资本逻辑及弊端，以人民作为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目标和价值尺度，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并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体现了发展的人民性原则和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这一人民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提出了避免“人的异化”和实现人的解放及本性复归的可行性路径，为人类对更好发展模式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结合实际，请你谈一谈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

（2018年01月31日13:3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特别是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GDP的世界占比由2.7%迅速提高到目前的近15%，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今非昔比，这就要求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前景不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征，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以来至2016年底，全球经济增长由前10年的年均4.13%下降为2.85%，全球贸易增速由年均11%大幅下降为0.21%。虽然根据世界银行的判断，2017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有所回升，但复苏的不确定性依然客观存在，这就导致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弱化。

二是我国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强。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更加明显，带动外向型经济的传统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弱。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石油、天然气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压力在不断加大，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

三是国际创新驱动竞争更为激烈，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重道远。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正迎面走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力图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这些新挑战倒逼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向创新驱动型转换。但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方式粗放，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力度不够，使得很多产业竞争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他人。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状况，我们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需要主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为发展高质量型的经济腾出空间、留出时间。

四是我国市场需求结构升级加快，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高端制造品和高质量服务的需求更加突出，但国内企业的现有产品供给还不能很好满足需求结构的这一变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需求、高端制造品需求、高品质服务需求等高端需求转向海外市场。近年来，我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到国外采购消费品，到海外留学、旅游、就医，就是国内供给质量不能很好满足国内需求的真实反映。

上述内外条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我国原有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外需拉动、投资拉动、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向追求高质量和高效益增长的模式转变。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继续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白了就是让供方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提供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的一系列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延长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再降低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10%等一系列降成本政策。



供给侧改革的四个关键点：化解过剩产能，产能过剩就是总供给不正常的超过总需求，这样会造成资源浪费，所以要淘汰僵尸企业，加大产业重组；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比如减税，这样企业就有更多的资金去创新，去提高生产力；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样可以形成更好的股票市场，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二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 弘扬企业家精神。

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既极大地增强了信心、鼓舞了士气，为接续奋斗、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也扎实培育了乡村产业，有力发展了乡村经济，为实现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过去的2020年，乡村建设成绩喜人：粮食实现增产，生猪产能加快恢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1677万公顷，比上年增加70万公顷，全年粮食产量66949万吨，比上年增加565万吨，增产0.9%。年末生猪存栏40650万头，比上年末增长31.0%。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了“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困境，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作为乡村振兴之关键的产业振兴也是颇有成效，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亿亩，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年粮食产量一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当前及今后时期，高质量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进而全面提升发展质量效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各类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把改革开放推向广阔乡村腹地，提高城乡改革开放的协同性，持续增强我国发展动力和活力；有利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公共服务普惠普及，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有利于夯实乡村产业根基，实现产业振兴，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障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做好2021年和“十四五”时期工作，务必须坚持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作为新发展阶段的基础性、战略性、历史性任务来贯彻落实。当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突出做好三方面重点工作。

一是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抓好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从根本上彻底补齐乡村绝对贫困短板，牢牢兜住乡村振兴的底线。二是全面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紧紧扣住种子和耕地这两个要害，加强种子资源保护利用和优良品种选育推广，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和质量，完善灌溉设施，强化耕地保护，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从根本上保障好14亿国人的粮食安全。三是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和乡村建设。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稳步推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各项农村改革，加快发展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就业渠道，从根本上使亿万农民多增收、有奔头。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从根本上让美丽乡村吸引人留住人、留住青山绿水、留住乡愁留住根。

四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实现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社会空间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开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提升重要功能性区域的保障能力。

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聚焦实现战略目标和提升引领带动能力，推动区域重大战略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坚持陆海统筹、人海和谐、合作共赢，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维护，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打造可持续海洋生态环境，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五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求有序放宽市场准入，促进贸易平衡，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有效引导支持对外投资。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40多年来，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日趋开放的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判断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全面开放内涵，坚持主动参与和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面向世界，实行经济开放的同时实行各个领域不同程度的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必然要求。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中国共产党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就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过程中，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正是在对外开放中，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

进入新时代，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密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同时，世界经济深刻调整，新动能不足问题突出，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加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带来的新挑战凸显，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明显，国际贸易和投资壁垒不断提高，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逐渐蔓延发酵，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风险挑战加剧。世界面临开放与保守、合作与封闭、变革与守旧的重要抉择，既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开放型经济传统竞争优势受到削弱，传统发展模式遭遇瓶颈。同时，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市场规模庞大、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产业配套齐全，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仍然具备综合竞争优势。在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倒逼下，我国加工贸易加快转型升级，服务贸易持续快速发展，外贸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明显增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现实要求我们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推动开放型经济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成本、价格优势为主向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大幅提高，与国际社会互动空前紧密。中国一举一动，都吸引世界眼球。习近平同志郑重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在新时代，中国将以更负责的精神、更包容的胸襟、更高质量的增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

党的十九大总结中国对外开放宝贵经验，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作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一战略部署，既包括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也包括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做好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的基本遵循。

全面开放新格局体现在开放空间上，就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改变我国对外开放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区域格局，逐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分工协作、互动发展，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体现在开放举措上，就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自主开放与对等开放，加快走出去战略谋划，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等；体现在开放内容上，就是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按照这样的新格局，中国在对外开放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一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今后一段时期对外开放的工作重点。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不仅为中国扩大开放搭建了新平台，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深化地区合作。党的十九大指出，“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为此，要加强同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战略互信，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二是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必须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必须拓展对外贸易，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转变，从依靠模仿跟随向依靠创新创造转变，从大进大出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必须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健康发展，打造外贸新的增长点。必须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在更高层次、更广空间内参与国际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必须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加强对海外并购的引导，规范海外经营行为，努力实现共同、可持续发展。中国从2018年开始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这些掷地有声的话

语，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愿意打开自己市场、分享发展机遇的诚意和善意。在2019年11月如期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共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的三点建议，表明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贸易便利化的积极态度。

三是积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也是生产力。中国大力加强利用外资法治建设，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全面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尊重国际营商惯例，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努力为各国企业家在中国投资兴业提供更好环境和条件，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近年来，通过大规模减税降费、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等，2019年10月24日，世界银行发表《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由第46位上升到第31位，提升15位。2019年3月通过的《外商投资法》，更是确立了中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外商投资的准入、促进、保护、管理等作出统一规定。10月又公布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这是中国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标志着中国的营商环境将再上新台阶。

四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东部对外开放起步早、发展快，西部对外开放起步晚、发展慢。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不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在对外贸易、吸引外资方面都保持着较好发展态势，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由于发展基础较弱、基数总体较低，西部地区依旧是中国区域开放布局中的“短板”。数据表明，西部地区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20%的经济总量，而对外贸易仅占全国的7%，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7.6%和7.7%。党的十九大提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等优势，深化扩大开放，促进开放格局更加优化。

五是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进入新世纪以来，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进程受阻，开放水平更高、灵活性更强的区域贸易安排蓬勃发展，成为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引擎。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既是拓展自身开放空间的需要，也体现了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责任担当。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优化开放布局、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重大举措。截至2019年底，中国一共设立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东南西北中各个方位。2018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持续深化差别化探索，加大压力测试，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中国不仅要把海南全岛建成自由贸易试验区，还要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为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不仅积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还反复强调中国坚持共赢开放，而不奉行零和博弈。习近平同志鲜明指出：“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这向全世界有力宣示了中国对外开放致力于共赢多赢的博大胸怀。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现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更充足资本、更丰富产品、更多合作契机。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有风狂雨骤，那就不成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五千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开放应该是双向的、互利的，而不应是单向的、一方受益的。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各国应该携起手来，积极推动开放合作，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值得指出的是，推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制造业既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产业领域。没有强大的制造业，高质量的经济也就无从谈起，我们要谨防包括金融资源在内的各类资源“脱实向虚”的倾向。需要以建设制造强国为载体，面向新技术发展趋势，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制造和服务的融合与协同发展，加快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群，增强我国制造业的集群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最终都要落脚到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上来。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加大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力度。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大变革”，从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高质量发展带来什么新变化？

第一、要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是从短缺经济开始起步的，几乎什么都有缺口，所以过去四十年主要工作是填补这个数量的缺口。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开始过剩了，无论是工业品还是消费品，都出现了相对的过剩。但我们质量的缺口依然很大，产品的质量、服务的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从中观的层面来看，我们产业的价值链跟先进国家相比相对较低。我们以前主要是加工、组装，在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品牌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在品牌调查中，国外评选全球100个最好的品牌，中国的品牌外国人一般只知道两个，一个是华为，一个就是联想，其它的很难说出，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的差距。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我们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有差距。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比还是有很大差距。我们未来主要的任务，要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要在这些领域逐步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们正在从高速增长逐步地转向中速增长。这个变化过程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本世纪以来，季度增长率的变化曲线最高点在2007年的二季度，增长率是14.8%，我们今年二季度的增长率是6.7%，下降了8.1个百分点。特别是2010年二季度以后，我们经济差不多是在一个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这就是一个换挡的过程，所以说这里面一定有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那么这个结构性变化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去观察。首先从供给端可以看到，中国的生产要素供需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按统计局的口径，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16到59岁的人口。2012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开始减少，2012年减少205万，2013年244万，2014年371万，2015年487万，2016年349万，去年减少了500万左右，这就是劳动力的总量正在减少，说明劳动力的供需条件开始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取决于我们说的要素，就是劳动的投入、资本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的投

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开始放慢了；资本的投入随着养老支出的增加，我们的资本积累水平也会下降，这个增长也会放慢。所以，未来我们说最关键的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个就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含义。

第二、要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我们的传统产业都达到了市场需求的峰值，不可能再扩张了。我们的钢铁产量多大？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大概是3800万吨钢，1982年宝钢建成了，我们是4000万吨钢。我们以前的工业化路线叫以钢为纲，到今天我们钢铁产量多大？11.3亿吨，现在的问题是多了。

第三、要从过去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以前靠要素驱动，为什么？有本钱。我们有充裕的劳动力，土地资源还很丰富，矿产资源还有足够的储备量。但是，到今天劳动力开始减少了，我们的土地越来越稀缺，资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了。供需开始发生变化，我们还能依靠要素投入吗？我们条件越来越不具备，所以我们要转向提高要素的生产率。转向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就要靠研发、靠创新、靠人才。但是我们新的瓶颈出现了，就是研发能力，创新能力。我们要提升产业价值链，以前我们都是去争资源，现在开始抢人才。最近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我们现在好多地方用直接落户，比如上海说北大、清华毕业的直接落户，有的还有购房优惠、住房补贴，我还给你项目资助，现金奖励，来一个院士我给多少钱。为什么现在开始大家争人才了？它怎么不抢资源了？这说明我们的瓶颈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要质量追赶，包括技术、研发、创新能力的追赶。

转向高质量发展具备哪些条件？

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和配套网络，其中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数量可观的海淘大军？我国制造业连续8年世界第一，但从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2017年“世界品牌500强”名单来看，我国入选品牌仅有37个，约占7%。在全球知名品牌咨询公司英图博略（Interbrand）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最具价值100大品牌”排行榜中，我国制造业产品品牌只占2席。这又是为什么？

1、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经过这几十年的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我们以前经济主要是投资驱动，这些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高，我们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半壁江山了，是指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消费贡献的提高，服务业占比的提高，改善了我们的经济结构，增强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中国这些年经济波动是历史上幅度最小的、最稳定的，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了一个最基础的条件。**

2、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

中等收入者有什么特征？**他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开始追求产品的质量、品质、品牌。**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境外消费的规模，有好多跑到海外去买，为什么跑到海外买？国内不都能生产吗？他开始追求质量、品质、品牌，当然也包括性价比。所以这就逼着我们企业一定要提高质量，你不提高质量，你就会失去市场份额，这就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市场驱动力。

3、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

我们的研发投入，这些年提高非常快，研发投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12%，超过了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当然，我们离有些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的。一些中心城市、发达地区，研发投入比重很高了，有的甚至超过5%，大量的投入也带来了我们能力的提升。我们这些年还是涌现出一些世界级的、创新型的、引领型的企业，比如老百姓经常说的叫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是互联网企业的前十位，我们有份额。我们在其它的领域还有一些标志性的企业，这也说明了我们还是有大的进步。**我们创新和“双创”活动，还是非常广泛地深入地在展开，这些为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条件。**

4、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们还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改革是转向高质量发展一个最根本的途径。**

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土地、资源供需形势变化，生态环境硬约束强化，“数量红利”正在消失，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必须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1、传统发展方式惯性大

传统的发展方式的惯性很大，想要把它扭转到新的轨道、要扳过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很容易就形成路径依赖，习惯过去的做法。我们过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搞刺激。为什么不能再过度地依赖投资去拉动增长呢？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投资的边际效率不断降低。我们每新增一块钱的投资，它的产出会越来越低。在投资效率下降的情况下，想要保持产出的稳定性，就需要更多的投入，这样就会产生更高的负债。我们的杠杆率，也就说我们总的负债规模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会越来越高。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树不能长到天上去”。如果负债过高，总有一天就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体现在金融风险。所以我们不能又回到老路上去。

2、结构性矛盾突出

第一点，在实体经济领域，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又叫供需的错配。我们的需求在不断地升级，高端化、个性化、服务化的需求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我们的服务消费差不多已经占了消费的50%左右，我们越来越多购买的是服务，而不是商品。我们的需求正在升级，而供给端是什么呢？钢铁、煤炭、玻璃、建材这些传统工业比重很大。现在消费需求在迅速升级，而供给跟不上升级的步伐。

第二，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叫脱实向虚。金融为什么要脱实向虚？如果实体经济很赚钱，它为什么要脱实向虚呢？这说明实体经济效率不够高。你比如说，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回报率过去这些年逐年下降。为什么下降呢？资源不能有效地流动了，该退的退不了。

第三，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房地产占用了大量金融资源，而金融资源又不愿意流到实体经济去。为什么愿意流到房地产呢？因为房地产还有回报。但房地产能创造价值吗？能带来我们的创新吗？能带来我们技术进步吗？

3、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我们的发展不平衡，矛盾也很突出。**对一些发达地区来说应该转型，但是还有很多落后地区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沿海有十个省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2015年就超过了一万美金了，有的省份按世界银行标准已经进入到高收入的标准了。但是，还有内陆一些省份差距还很大，发展存在差异性，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的问题。

4、体制机制存在制约

我们有些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调适。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扭曲了资源配置。我们土地是很稀缺的，但是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工业开发，居然可以搞零地价或者叫变相的零地价，这不就是扭曲资源配置吗？越缺的东西应该越贵呀！价格的扭曲带来了这种资源的错配，这些都是体制上要解决的问题。

5、政府管理方式不适应

以前我们圈地，招商引资下指标，招来项目都有奖励，这一套熟门熟路。现在说我要转向高质量发展，怎么下手？怎么干？我们要提高质量，要有一套标准体系，要有一套绩效考核体系，这些都是面临的新的课题。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么难，我们还转不转？有的人说干脆别转了。不转会有什么后果呢？在中等收入阶段就止步了。韩国、日本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人均收入持续地增长，很快就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同样有很多国家，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它们就在这个区段持续地徘徊，因为它们的经济没有转变。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十大策略

2018年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8%。前5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5%，旅游、文化等服务消费持续较旺。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发展，文化、旅游等消费升级类产品快速增长，这些释放出哪些积极信号？在充分认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创新能力不强、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三大攻坚战”任重而道远，面对这些困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1、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质量需要靠竞争来提高，要提高质量，必须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竞争才有创新，竞争才有质量，竞争才有品牌。中国在数量追赶时代就对特定的行业给予特定的支持，因为那个时候目标很明确，但目前阶段，我们逐步发展到前沿地带，到了“无人区”，这时候尤其需要企业通过试错、竞争来找到下一步的目标。竞争政策一定要起到基础性的作用，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2、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为什么要保护产权？**产权激励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我们经常说，你为什么要去干这件事，它后面一定有激励机制才起作用。什么最有效？我们说产权激励是最有效的，比如农业的改革、农村的改革就最典型。我们经常说，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篱笆还是那个篱笆，以前就是吃不饱，成天没夜地干，吃不饱。现在你说什么变了？月亮变了吗，没变；篱笆变了吗？也没变；什么变了？土地承包了，产权变了，产权它确权了，它可以流转了。

3、推进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怎么样提高效率、提高质量？资源和要素要流动起来，优化配置。凡是不流动的，都不能有效配置。那改革开放我们怎么释放了那么大的潜力？要素可以流动了，农村的劳动力可以到城市里打工了，所以它的生产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我们商品和服务基本市场化了，大概99%的商品都市场化了。现在我们政府定价的电价、水价很少，都是市场化了，但是我们的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土地完全市场化了吗？当然没有，还有很长很长的路。所以你怎么让它优化配置？资金完全市场化了吗？有人说利率市场化了，是不是完全市场化了？这个可以讨论。那么劳动力完全市场化了吗？还有城乡的身份的差异性，还有户籍制度，你没有户籍的话，就享受不了很多福利。

4、完善科技的创新体制

我们还要完善科技的创新体制。我们科技人员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怎么完善它的体制？就是要形成科技成果的产权激励制度。我们科研人员大部分都在国有的事业单位，你的研发、你的创新、你做出来的专利、你做的成果，所有权却是单位的。忙活半天，都是单位的，你说它释放出来了没有？所以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在试点，就是分割产权。你做一个研发项目，在启动前就跟单位签个协议，研发出来以后，这个产权，我们课题组、研发团队和你单位怎么分？我们先说好。这个就叫产权激励，这会极大地解放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5、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当然有很多内涵，比如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现在很难做到起跑线一样，因为有重点学校，所以附近的学区房就很贵。还有一个更大的差异，就是农村来的孩子、农民工的孩子能不能享受到同等的教育。这就涉及到我们说的公平的教育，让每个人都能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人生出彩的机会，这就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那么更重要的我们要改革教育制度，就是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想象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不能老师说是什么就是什么，老师说的永远都是对的，那科学还进不进步了？**

6、提高空间资源的配置效率

王一鸣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来推进城市化。城市群有高速的通道，它的要素、资源能充分地流动，能实现优化配置，这样就会大大提高空间的配置效率。

7、有效应对污染排放峰值期的挑战

我们要有效地应对这个污染排放峰值期的挑战。我们现在不光传统产业在达到峰值，我们的排放也在陆续达到峰值。这段时间我们正好是各种排放物陆续达到峰值的时期，所以环境的压力就特别大。我们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来解决生态问题的这个窗口期，而且我们正处在这么一个阶段。

8、健全风险的管理体制

我们现在也进入到各类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易发、高发期。我们宏观杠杆率相对比较高，就是我们过去顺周期的市场环境积累了一些风险，我们也到了这种风险的释放期。**所以我们要健全风险的管理体系，我们要使我们的管理能力、监管能力要跑得过这种风险积累的速度，要有效地管控风险。**如果发生大的风险了，你何谈高质量发展？

9、进一步扩大开放

开放，才会有竞争；开放，才会向国际更先进的标杆看齐。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包括现在正在做的降低制造业的股比限制。在一些比如说汽车，原来都有股比限制，现在不设股比要求。金融业，比如说银行、保险、证券、期货，我们有个过渡期，但是未来要逐步地放开准入。那么还要创造一个最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让别人愿意来，像一块磁铁一样，能把各类要素吸引过来。

10、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对应的考核体系

我们要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对应的考核体系，包括指标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体系、政绩考核体系，就是要引导人们的行为往这个方向走。

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为此，必须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经济体制、开放格局，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着力建设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有效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必须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以协同发展的方式推动国民经济走向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

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协同”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以协同的方式汇集各个部门各类资源的发展潜力，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以协同的方式推进各个领域各类区域的统筹协调，实现“平衡发展”。为此，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新能力建设为支撑，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以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发展，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破解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难题。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体经济发达、虚拟经济先进的产业体系，是科技进步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份额提升较快、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产业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得到巩固、现代农业在第一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也是产业布局合理的产业体系。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化解产业空间布局上的不平衡问题，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协同发展的方式实现“区域协调”。此外，空间布局上的优化也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只有使创新引领和城乡发展统一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之中，三者交互融合，才能构成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战略。

着力打造政府与市场融合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制

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离不开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生产关系方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以深化改革的方式推进制度变迁和生产关系变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打造政府与市场融合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制。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打造政府与市场融合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总结经验，开辟新路。

第一，把握市场规律，优化长期发展战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的“五年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国家发展规划能够从设计走向现实，关键就在于政府的战略规划是以市场规律为前提。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也是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未来加快完善现代化经济体制，必须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国家发展规划的设计与实施，也必须科学把握市场规律，顺应经济发展大势。

第二，鼓励适度竞争，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的发展需要政府参与，政府的发展也需要借力市场竞争。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成功经验就是“分税制”下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展开的竞争，尤其是近年来地方政府主导下各地大规模产业集群的崛起，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打造现代化经济体制必须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努力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借助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以市场力量聚合各个地域和领域资源。其中，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应是重要着力点。

第三，统筹国内国外，打造国际竞争优势。我国对外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与市场“交融互动、互补共荣”的过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政府与市场的“交融互补”。政府基础研究与企业创新开发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着力点，必须面向新的国际竞争格局进行协调升级。同时，争取国际话语权、规制跨国资本行为以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也同样需要政府与民间的双重智慧和力量。

着力构建全面开放共商共建共享的现代化开放格局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需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置于开放系统之中，落实十九大报告“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战略要求，着力构建现代化开放格局。

现代化开放格局与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所积淀的基础相适应，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相匹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把开放基础建构于“质量中国”之上，强调通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要推动创新、提升品质、塑造品牌，促进攀升国际产业价值链。二是把开放客体从对外开放提升为双向开放，不仅“引进来”，更要“走出去”；不仅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不仅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领域有序开放，也开启数字经济与网络经济开放新空间；不仅关注人才、技术、创新能力的交流，也推进中国经验、中国倡议、中国标准的全球认可。三是把开放导向从主要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转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的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引领新型的公平公正的全球化。

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构建现代化开放格局需要围绕新模式、新平台、新业态、新领域、新优势，从“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开放布局、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等方面协同推进。一是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形成与经济发展新形势相适应的开放和合作新模式。二是要大力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等新平台，加快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减少外资限制措施，下放自由贸易区的改革自主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使之成为中国新一轮开放的示范区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高地。三是运用新的信息技术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新业态。四是要扩大服务业等新领域的开放，同时要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五是要加快提升国际经济治理话语权，打造开放新优势。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承担大国责任，成为未来规则制定的主要参与者，把“一带一路”倡议演绎为新的国际公共品，有力支撑发展中国家对公平全球化的利益诉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先进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的有机整体，现代化产业体系、经济体制和开放格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载体和空间展开。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经济体制和开放格局互动发展，是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 1、要着眼于坚持问题导向。

要敢于触及矛盾、长于解决问题。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 2、要着眼于推动创新发展。
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首先要解决好动力问题。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 3、要着眼于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
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这场攻坚战。
- 4、要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目的。如果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的期待，不能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发展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主要制约有哪些？其举措？

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在原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打通制约循环的堵点，更是要创造新的循环发展模式。我们既要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也要把工作着力点，不断拓展和深化新的竞争优势，夯实适应新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变化要求的新的经济发展基础，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和主攻方向，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当前，国内外环境纷繁复杂，机遇和挑战之大前所未有。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百年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主动调整，我们要进一步理解其中的核心要义，找准制约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堵点、痛点和关键点，采取务实举措迈好第一步。

四个重要特点

新发展格局不是对原有格局的小修小补或简单纠偏，而是全新的理论、全新的理念、全新的任务和全新的模式，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对国民经济循环的系统性再造与升级。从一定意义上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基于超大规模经济优势基础上的安全发展，是融入参与发展模式向主动引领发展模式的一次跃迁，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内需主导，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出发点。新发展格局区别于原有格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发展的基点和初始动力放在国内，把满足国内需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打造强大国内市场。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

二是创新驱动，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为根本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在前沿领域形成领先优势。

三是安全可控，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为重要基础。新发展格局要求大幅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实现能源、粮食、金融等重要领域安全可控。

四是联通国际，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主要路径。我们既不能因为重视国际循环而抑制国内循环，也不能因为追求国内循环而忽视国际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既要拥有强大国内市场并对世界市场有重要影响，也要拥有强大的国内生产能力从而对国际生产有较强引领和带动能力；既要有强大的技术支撑与国际先进技术充分交流互鉴，也要有强大的人才支撑和顺畅的国内国际人才流动机制源源不断地培养和吸引全球优秀人才。

面临的主要制约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循环还不够畅通，重大经济比例关系还存在一定失调，制约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主要表现在：国内统一大市场还不完善，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不高，供给体系与需求体系不够匹配，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均衡，“卡脖子”束缚较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流通的体制机制问题较多，产业链创新链的联动、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的联结、城乡区域的一体化融合发展还存在不少瓶颈制约等。受此影响，我国经济运行中产能过剩与消费能力外流并存，社会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偏高，内循环不畅，经济发展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同时也影响了民生福祉的改善。

进一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在原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打通制约循环的堵点，更是要创造新的循环发展模式，这意味着我们要对原有格局进行战略创新和战略转型，不断拓展和深化新的竞争优势，夯实适应新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变化要求的新的经济发展基础。当然，这种系统性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所涉及的惯性和阻力将比较大。比如，长期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路径依赖使我国经济对国际循环依赖度较高，导致核心技术缺失、国内市场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问题较为突出，制约了国内大循环的畅通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五大举措建议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既要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也要把工作着力点，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一是努力增加居民收入，释放内需潜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扩大内需、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是关键。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密切相关。要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重点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让老百姓“有钱花”。同时，还要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力度，增加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和兜底能力，免除消费者后顾之忧。

二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创新驱动能力。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是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关键。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推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群体性突破，实现关键领域自主可控。要着力加大前沿基础研究投入，强化数学、计算机等理工科及交叉前沿学科等领域人才培养，营造有利于国际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发展的政策环境，充分激发人才活力。

三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稳定性。这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基，离开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和稳固安全的产业链来构建新发展格局，就如同在沙滩上造房子，既不安全，也不可靠。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强化“要素—平台—制度”三维支撑，探索建立新型技术攻关突破机制、创新产业政策支持机制、优化产业链上下游和跨领域协作机制等，构建有利于产

业基础再造的创新服务体系和制度环境，加快推动重大基础装备、关键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高端工业软件和质量基础设施等产业基础技术的突破与升级，努力构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基础体系，稳固产业链安全。

四是清除制度性障碍，建设强大统一国内市场。循环的本质是“互联互通”，流通体系贯穿国内大市场、大循环的全过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商品市场方面，应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全链条标准体系建设，发展“互联网+流通”，推进交通物流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提高流通服务功能。在要素市场方面，应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疏通要素流通的阻滞因素，促进各类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此外，还要着力强化金融对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作用。

五是坚持扩大开放，提高内外循环畅通性。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为主要着力点，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在开放中进一步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通过建设高水平自贸区、自贸港等，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在规则、制度、技术上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如何理解评价政治制度民主性和有效性的八个标准，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判断：“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个重要论断提出了对国家政治制度优劣进行科学评判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制度理论的新成果。

27年前的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曾经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我认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个能否”标准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邓小平三条标准的深化与具体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八个能否”标准是对人类国家政治制度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

这一论断的科学性体现在：第一，全面性，这一标准从涉及国家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述，既涵盖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的实施状况，又包括国家决策的民主与效率；既包括国家领导层的更替问题，又涵盖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问题。第二，辩证性，这一标准强调一个有效的国家政治制度不仅应当是民主的，还应当是有效的。当今世界上有不少政治制度虽然是普选民主的，但是没有效率的或者是低效的；有些政治制度虽然是有效的，但不是民主的。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就是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第三，开放性，这一标准是总结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而得出来的，体现了其开阔的视野。

“八个能否”标准既提出了判断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也提出了判断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

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意味着全体人民能够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切实防止了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意味着人民群众能够畅通表达利益要求，切实防止了表面上有言论权、实际上无言论权的现象；意味着社会各方面能够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切实防止了“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意味着国家决策能够做到科学化、民主化，切实防止了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意味着国家领导层能够依法有序更替，切实防止了权力倾轧、政局动荡的现象；意味着各方面人才能够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切实防止了“萝卜招聘”、“因人画像”的现象；意味着执政党能够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切实防止了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意味着权力运用能够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切实防止了“牛栏关猫”、“老虎自由出入笼子”的现象。

以“八个能否”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可以看出其独特的优越性

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安排，既是民主的，又是有效的。

首先，它是民主的。这体现在：这套制度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真正广泛、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深度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在国家层面和基层层面等各个层面上都能够行使自身的民主权利；能够科学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民主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中央地方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国家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其次，它是有效率的。这体现在：这套制度能够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并善于把这一优势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以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为基础，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之所以有效率，原因就在于它是“不民主的”，是所谓“权威主义的”。恰恰相反，中国国家政治制度的效率来自于其民主性。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以其日益完善的党内民主制度、不断丰富的人民民主制度、愈益扩大的协商民主制度、越来越充满生机的基层民主制度，调动着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能动性，使全社会的创造力迸发出来，形成创造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的局面。

中国国家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来自它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和新中国成立65年来的艰辛探索

中国国家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来自哪里？首先来自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不能找到中国富强的正确答案。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既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又为人民参与国家各方面的事务提供了途径。

其次来自于新中国成立65年来的艰辛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36年的实践创新。36年来，我们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决定性成果，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坚持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效凝聚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 and 力量；努力建设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证了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积极发展广纳群贤、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广泛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社会法治水平不断提高；建立健全多层次监督体

系，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这些实践成果上升为理论，就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个能否”的标准。

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又是有效的，这一点为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所承认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2009年就认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纵向民主”。他认为：支撑新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这些上下互动的积极性得到了鼓励，并允许根据情况和环境的不同灵活变化，只要符合领导层所制定的总体目标即可。“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新思想和经验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轴交流。这种纵向模式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在这个纵向民主社会中，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参政议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也在逐步提高。”当然，中国的民主不仅仅是纵向的，而且也是横向的，是综合性民主，是形式与内容不断统一着的民主。

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民主的，而且有着高效能。弗朗西斯·福山在2012年指出中国的治理方式是很多国家的范例。他强调从国家的现代性出发来分析，中国的国家绩效是显著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度高效，中国的制度化在大多数方面是高水平的；二是工作绩效，无论是党内还是政府系统在官员提拔上都重视政绩；三是回应性效能，中国政府努力给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尤其是安全、就业、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等，这远远超过了大部分类似的体制。

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承认中国国家政治制度具有自身的优势和优越性，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更应该增强制度自信，坚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前行。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根据我国国家制度的理论基础、制度构建和成功实践，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要义是：第一，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体现在国家根本性质上，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现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就是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第二，国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和体制机制，保证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三，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四，国家制定实施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必须体现人民意志、尊重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第五，国家各方面事业和各方面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活动规范，实现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相结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促进，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因此，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

如何理解“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全过程的民主”

■ 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更是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实现了对西式民主的超越。因此，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将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

■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能够并且必然要坚持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能够始终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在政治生活和一切治理活动中体现人民意志。

■ 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其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其一切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都来自人民，为人民利益而制定和实施。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参与国家政治决策和社会公共决策，能够有效保障自身权益。

■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要经过一代又一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理念，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民主的实质内涵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可以说，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更是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实现了对西式民主的超越。因此，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将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对西式民主的超越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学说，在实践上契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趋势，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体现人民意志。民主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一种政治理想，其本意是要求实行多数人的统治，体现人民意志。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任何民主都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它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经济基础所决定，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列宁曾指出，民主“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尽管资本主义民主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但它在本质上是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和保障资产阶级利益而建立的政治制度，民主实际上被局限在资产阶级内部。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曾撰文指出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统治，1%享用”。他说：“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事实上，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塔尖1%者的跟班，靠塔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与之相反，社会主义民主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

旨，能够并且必然要坚持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能够始终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在政治生活和一切治理活动中充分体现人民意志。

保障人民权益。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能够保证人民权益，主要看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等等。西方国家一直宣扬西式民主是平等的、公正的，但实际上，西式民主常常被金钱、财团、媒体和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并演变成一种“富人的游戏”和“钱袋的民主”。占有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完全有可能用金钱（如政治献金）掌控选举过程，使选举结果最终更符合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需求，而不是代表选民的利益。对于西式民主，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其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其一切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都来自人民，为人民利益而制定和实施。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国家政治决策和社会公共决策，管理国家各项事务，有效保障自身权益。

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是否具有全面深入的参与实践是区分形式化民主和实质性民主的一个重要尺度。在西方，国家机器和政治资源实际上被操纵在资产阶级特别是少数经济实力雄厚且能与政府相互勾连的资本财团手中，而广大人民群众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民众政治参与热情越发低落，参与投票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80%下降到本世纪初不到60%。2016年3月底4月初，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法国和美国，接连爆发了“黑夜站立”“民主之春”抗议示威活动，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街头，向政府和社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要探寻公民参与民主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在探索和推进民主建设过程中，我国找到了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即能保障人民进行广泛的多层次参与的协商民主。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充分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

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制度程序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想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西式民主用权力分置的原则维护资产阶级的总体利益，为了照顾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主要西方国家在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上大致采用了分割、制约和平衡的方式，这就造成利益集团和政党更多地是在对抗的制度设计下开展政治活动，彼此掣肘、相互否决成为常态，严重影响国家治理效能。为了从制度上确保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样一套制度安排，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

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旗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事实充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立足新时代，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伟大实践，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最鲜明的特征、最显著的优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任何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者相互取代的主张和做法，都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核心理念和实践要求。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将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就必须在国家制度上作出总体安排和顶层设计，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来运行和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实现途径和制度载体。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协商民主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阵地和重要平台。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建立健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充分表达意愿和诉求，增强了对民主政治的认同，调动和激发了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充满旺盛生命力。

增强制度自信，保持政治定力。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实践充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在民主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政治定力，既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同时又必须破除对西式民主的迷信，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就是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和新突破。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虽然是个好事物，但也是个新事物，并非完美无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要经过一代又一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理念，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那么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个重大论断深刻阐明了我国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对此，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加深理解。

第一，国家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国家制度展开。我国的国家制度是党领导下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制度，包括党的领导制度，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之上的关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重要制度和法律体系。这一制度体系全面规定了国家各方面事业发展的性质定位、相互关系、运行规则，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国家治理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一切工作和活动都必须严格依照国家制度展开。只有这样，国家治理才能确保正确的前进方向，才能实现有条不紊运行，才能取得应有的治理效果。

第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基本依托。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制度落实到国家治理中的具体化、实体化，它包括国家治理的组织领导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力量构成体系、资源要素体系等。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复杂、巨大的系统，仅就其组织领导体系而言，就包括党的领导体系、政权结构体系、国家法治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等，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协调行动的系统工程。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它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治理能力。只有构建起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国家制度才能得到切实执行，才能具体落实到国家治理中，才能使国家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第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工程。好的制度规范指导好的治理，好的治理又会完善形成更好的制度。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互动共进中推动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定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朝着现代化目标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的国家制度，是确保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落到实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同时，必须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力，加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国家制度决定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既基于国家制度、落实国家制度又不断丰富完善定型国家制度。先进的国家制度，加上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着眼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适应时代变化和人民期待，一方面要着力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不断构建和完善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另一方面要注重制度运行，增强按制度办事的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以人为本：推进“改革落实”与“群众工作”密切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框架内，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环境和技术等既有条件，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各类治理实践之中，把尊重人的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维护人的权利，实现人的理想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制度机制设计和各项治理措施上加以全面落实。

一方面，将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各方面需求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支撑。另一方面，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在改革方案落地过程中，要处理好政策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的关系，把抓改革落实同做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因地制宜，逐层细化，精准有效，确保改革举措落地见效，确保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固本强基：提高“干部履职”与“群众管理”能力

治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要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

一方面，提高“干部履职”能力。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有效运转，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另一方面，提高“群众管理”能力。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以切实提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效能。

落地落实：强化“干部执行”与“群众参与”过程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执行的关键在于基层干部有效执行和基层群众的有效参与。

一方面，增强“干部执行”政策效能。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确保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作安排都按照制度要求落到实处，使制度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以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效。另一方面，强化“群众参与”过程。基层创新通过扩大基层群众参与、培育社会组织等方式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到服务型转变等方面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当前，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鼓励基层创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同时要加强对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

如何理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如何进一步健全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

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在面临磨难和灾害时得到锤炼，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应对风险挑战中经受检验。

新的一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大功告成之年。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湖北、蔓延华夏大地，中华民族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诉全党全国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总书记言犹在耳，严峻的现实已然降临。面对巨大的灾难，习近平总书记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世界声明：“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下，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奋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汇聚起排山倒海雄伟力量，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牢记总书记的教导，清醒地认识到，抗击疫情，既是一场大仗、硬仗，也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深度检验、一次综合性大考，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奋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确保战胜疫情，确保如期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

——这是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力的一次大考。传染病伴随人类历史发展全过程，防控传染病是人类难以回避的一大难题，也考验着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特别是执政党的治国理念、决策机制、领导水平和组织能力。当疫情袭来时，特别是在疫情初露端倪，信息有限、科学结论不足、一些事态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如何科学预见、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争分夺秒对疫情防控作出战略判断、战役部署，为疫情防控争取时间、赢得主动，这是对领导体制机制的考验，是对治国理政能力的考验。这次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显著优势，以疫情发生发展的客观现实情况、对疫病的最新科研成果和传染病救治特点、传播规律作为决策判断依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果断决策，迅速将疫情防控工作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疫情展开了坚决斗争。

面对传播迅速、危害巨大的陌生病毒，面对十几亿人口在传统佳节大流动、大聚集的特殊时期，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这就需要统一号令，统一行动。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作出决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依法将这种陌生的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措施严格管理，并及时制定实施一系列战略策略。把武汉和湖北作为全国主战场、作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1月22日果断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这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关键一招，也是最有效手段，作出这一决策谈何容易，需要巨大政治勇气。同时，对其他省份按照地区特点和疫情形势因应施策，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各方力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这样的果敢与决断，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下，在坚强领导核心的统率下，才能够实施，也能够获得成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劣和效率高低，在应对重大危机关头，更能得到明明白白的检验。不少外国政要评价说，这样的果敢和决断，这样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只有中国才能做得到。如果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处在一种互相掣肘、各怀心思，久拖不决、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力的制度环境中，就难以想象如何能做到举国上下闻令而动、动静有序，同舟共济、一致抗疫。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种救治、防控力量和资源源源不断向一线聚集。全国优势科研力量集中攻关，“用创纪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来自全国各地的4万多名医护人员，携带精良医疗设备，火速驰援武汉、驰援湖北，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的救治和防控工作；重点医疗物资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拨，集中送到抗击疫情第一线。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广大党员率先垂范、迎难而上，从城市到乡村，从公共场所到居民小区，全国动员、全民参战。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严肃评价道：“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世界更为惊叹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力指挥疫情防控战役的同时，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的时机，从战略着眼，以科学为据，号召全党全国“两手抓”，一手抓疫情防控工作，一手抓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强调要激发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都抓好，完成预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不能有缓一缓、等一等的思想”。强调要准确分析把握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保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大灾大难是一块试金石。疫情发生以来的斗争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抗击疫情的主心骨，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战胜疫情的根本保证。疫情防控斗争的实践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定海神针”，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做到“两个维护”。越是遇到重大风险挑战的时候，“两个维护”的巨大威力和不可替代性就越清晰地体现出来。

经受抗疫斗争检验，未来前进道路上，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重大历史课题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就有了更加科学的依据。

——这是对“政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力，首先看这个国家执政党的政治能力，看政治纲领、执政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看党员的实际行动，看其执政基础是否稳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在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更加牢固。在这次疫情防控斗争中，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各级党委政府和党员的政治行动力得到了集中检验，为有效实现政治领导、组织动员群众、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疫情汹涌而来的时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响亮号令，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用坚决、迅即贯彻落实的行动证明，我们党不愧是以人民为中心，有极其卓越强大的执政为民力量的伟大政党。党的各级组织领导有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把投身抗击疫情斗争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磨刀石，广泛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党旗始终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人民军队作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闻令而动、即刻出征、冲锋在前，生动诠释和巩固军民鱼水深情。

在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度里，短时间内通过政治号召和组织把各方面力量有序动员凝聚起来，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抗疫斗争中，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巨大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凭借强大的政治体制机制，生成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行政执行力，不仅把这件在一些国外人士看来难以做到的事情做到了，而且各项救治和防控工作做得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对数万名确诊病例、疑似病例集中收治、全力救治，对几十万名密切接触者开展医学观察，组织数以千万计可能存在风险人员进行居家观察。对重症患者实行一人一案，院士领衔的强大专家团队进行临床一线指导。对全国所有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重点场所和密闭交通工具采取通风、消毒、测体温等措施，暂停一切大型活动，暂停旅行社旅游活动，最大程度减少公众聚集性活动。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防控信息，建立有效协同的省际间联防联控机制。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以县域为单元调整实施差异化防控策略，努力把疫情对改革发展大局的影响降到最低。

我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还积极主动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不仅对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作贡献，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采取的坚决有力的防控措施，展现的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

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为世界防疫树立了典范，为人类作出了贡献。

一件件具体的救治、防控工作看似只是“专业性”、“技术性”的工作，背后却都凝结着各个层级的政治制度架构的领导、组织、协调、运转力量。抗疫初期，一些局部的、个案的乱象让人揪心，而这正是政治行政机制尚未及时跟进运转的暂时现象，一旦各路人马各就各位，情况很快就根本改观。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级立法、执法、司法部门，还有参政议政党派，以及各类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虽各司其职，但用力方向一致，最终都汇集为抗疫斗争的强大合力，好钢都用在刀刃上。在危机时刻，中国政治制度运转的高效率明白无误地展露在世界面前。

经受抗疫斗争检验，未来前进道路上，在执政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中国的政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就有了更加科学的依据。

——这是对“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十分清楚，打疫情防控阻击战，实际上也是打后勤保障战。这是对我国经济制度和经济实力进行实战考验的时刻。一手抓确保战胜疫情，一手抓确保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这更是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人民坚持改革发展不动摇，极大解放发展生产力，极大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经济基础更加雄厚坚实，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逼近100万亿元，人均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样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实力是战胜疫情的重要物质和制度保证，也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

疫情凶猛，武汉作为疫情重点地区，自身原有的病床资源难以保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在疫情暴发初期，武汉迅速征用7家医院、安排3000余张病床，同时，党中央统一指挥全国支援，分别用十天时间火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两家专门医院，迅速大规模改建方舱医院。截至2月23日，武汉已建成16家方舱医院，累计收治患者1万余人，大大减轻了新冠肺炎患者的收治压力。这样急速扩张医院和病床数量的惊世之举，仅是国家经济力量的一个剪影。政府财政部门不断加大对抗疫防控的经费保障力度，截至2月23日，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99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共安排255.2亿元，加上世界最大全民基本医保网的强大支撑，确保人民群众不因担心费用问题而不敢就诊，确保各地不因资金问题而影响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

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救治患者需要大量医疗物资，做好全国各地的防控工作则需要更大量的口罩、防护服、酒精、消毒液、体温计等医疗物资，海量的需求与有限的物资存量形成巨大的缺口，连武汉一线医护人员都一时处于医疗物资的紧平衡状态。疫情暴发时，恰逢春节假期，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大多放假，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在中央的统一协调下，全面启动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全力解决用工、资金、原材料供应等问题。中央企业充分发挥主力军、国家队作用，不计代价、不讲条件，以战时状态全力加快转产扩产、多产快产。截至2月24日，我国医用防护服日产量达到33万套；截至2月25日，口罩日产量达到7619万只。湖北一线医务人员所需重点医疗物资得到了基本保障。

对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而言，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不是送考题，而是一道考验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期停摆。总书记和党中央运筹帷幄，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统筹兼顾，分类施策，要求疫情严重地区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他地区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分区分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充分显现出来，短时期内，五大类医疗物资企业复工复产率，加上转产、扩产后的开工率均达到和超过100%；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逐步提高，截至2月23日，浙江已超过90%，江苏、山东、福建、辽宁、广东、江西等已超过70%，民航、港口、水运均正常运营，电力、天然气和成品油供应充足。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但这种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指出：“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世界银行也发表声明认为，中国政府的举措能够缓和疫情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也表示：“中国经济继续展现出极强的韧性，我们对此充满信心。”2月23日，党中央召开了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形势，进一步对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进行部署，再一次表明，中国人民不会被问题和困难吓倒，中国有应对危机的强大物质力量！

疫情发生后，科学认识病毒、认识疫情，确定正确的诊疗方案、防控办法和有效药物，事关疫情防控成败，当此时刻，我国雄厚的科研力量快速响应、高效率工作，有力推动疫情防控工作走上科学轨道。在快速测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后，科研人员又很快研发出诊断试剂盒，开始大规模筛选治疗药物、研发疫苗。据统计，科研人员对70000多个药品或化合物进行筛选，遴选出5000个可能有效的候选药物，又选定100个左右的药物在体外开展活性实验，部分药物初步显示出良好临床疗效。疫苗研发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部分疫苗品种进入动物试验阶段，曙光在前，令人振奋。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雄厚的综合实力，是战胜疫情的信心所在。

发展是硬道理，经受抗疫斗争检验，未来前进道路上，在推进高质量发展方面中国的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就有了更加科学的依据。

——这是对“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战胜疫情，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顶天立地的精神支柱。实现抗击疫情的统一行动，首先要统一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判断和部署上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民心，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利器，中国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展现出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凝聚力。这些思想文化成就极大激励和凝聚了亿万中华儿女，为人民大众团结一心、步调一致抗击疫情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广大党员、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基层干部群众，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奋斗在最前线的勇士们，是抗击疫情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精神风貌是当代中国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面对病毒瘟神，他们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日夜奋战，筑起打不破的铜墙铁壁，用血汗诠释着责任与奉献，展现出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境界，展现出昂扬向上、同舟共济的时代风貌。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和凝聚起来的千千万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危难时刻毫不退缩，在各自岗位牢牢坚守、默默奉献，平凡中见精神，竭尽全力，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广大新闻工作者以特殊的方式参与战“疫”，他们及时传达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和部署，倾情报道火线英雄的感人事迹，帮助百姓大众了解疫情动态、学习防控知识，用文字、用镜头、用声音，在全社会激发正能量、弘扬真善美，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

“防范疫情，从我做起”。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本所在。人民群众把个人生活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克服种种不适和不便，严格执行规定、遵守秩序，主动配合防控工作。家国一体，在关键时刻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是无数人的主动选择、自觉行动，体现的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境界和使命担当。万众一心，就没有翻不过的山；心手相牵，就没有跨不过的坎。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讲：有这样伟大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民族，有这样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也是我们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量！

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精神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为无穷无尽的强大物质力量。经受抗疫斗争检验，未来前进道路上，在凝魂聚力方面中国的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就有了更加科学的依据。

——这是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社会治理的基础支撑在基层，城乡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能不能在社区构筑起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决定着抗疫斗争全局的成败。法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保障，同样也是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更好地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而极大地坚持和完善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是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是社会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有力支撑，也是当前举国抗击疫情的可靠根基。

全国基层社区构建的网格化治理机制，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快速建立健全区县、街道、城乡社区等防护网络，推动防控资源和力量下沉，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疫情防控，全面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在武汉，超过3万名干部职工下沉社区，对1100多个社区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网格化排查，挨家挨户叩门询问，查漏补缺，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北京利用党员“双报到”机制，9.4万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向社区报到，充实基层力量，筑起了一道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前沿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所打造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在疫情防控中大放异彩。疫情数据分析、春运人流监测、物资智能调配等广泛采用高科技，先进手段成为极重要的防控工具，在联防联控、精准施策上发挥了独特的支撑作用。

依法防控、依法治理，有力保证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各级政府依法审慎决策，严格依法实施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理措施，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及时准确报告和发布疫情信息，组织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传，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疫情形势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严惩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化解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对散播谣言、捏造诋毁的，对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对拒不服从管理、甚至大打出手的，对故意隐瞒病情和行程造成严重后果的，严格依法予以惩处。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关爱广大医务人员，要求务必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护、关心、爱护，从各个方面提供支持保障。为此，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迅速出台了诸多具体举措，全面落实医务人员的防护物资、生活物资保障和防护措施，统筹安排轮休，加强心理疏导，落实工资待遇、临时性工作补助、卫生防疫津贴待遇，完善激励机制，加强对他们和家属的人文关怀，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保证他们始终保持昂扬斗志、旺盛精力，持续健康投入抗疫斗争。

社会稳定是疫情防控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经受抗疫斗争检验，未来前进道路上，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就有了更加科学的依据。

——这是对“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安全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样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暴发的时候，如果环境问题千疮百孔，就很有可能与公共卫生问题相互交织叠加，造成更大的灾害，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大国，形成全世界最大的污水处理能力，全面治理江河湖海，大力度解决城乡居民的安全饮用水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发起“厕所革命”，建设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卫生城市，等等。这些成就为有效化解疫情带来的环境问题，阻遏疫情蔓延恶化，发挥了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

疫情发生以来，感染性医疗废物快速增长，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增速甚至高达50%以上。为了及时、有序、高效、无害化处置这些医疗废物，1月20日以来，生态环境部每天调度全国各地医疗废物处置设施运行和处置情况，与湖北省13个地市（州）“一一对接”。湖北省的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大幅提升，由180吨/天提高到648.6吨/天，武汉市由50吨/天提高到262.8吨/天。全国358个地市涉疫情医疗废物处置平稳有序。为确保各类地表水和地下水不受病毒污染，各地迅速成立应急监测突击队，加密监测频次，增加监测指标，用“真、准、全”的统一监测数据打消公众疑虑，守护一方净水。目前，我国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84%以上的行政村，绝大部分村庄人居环境有明显改观，为农村疫情防控打下了良好的生态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野生动物高度相关。疫情发生以来，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大查处力度，加强野生动物的市场管控。最高检要求从严打击各类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截至2月17日，在疫情防控期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184件271人。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美丽中国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经受抗疫斗争检验，未来前进道路上，在保障生物安全、生态安全方面中国的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就有了更加科学的依据。

疫情防控的大战大考是一面镜子，既反映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也暴露了有待加强的某些弱项短板，促使全国上下更加自觉更加有效地完善制度、加强治理、提高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在2月23日的工作部署会议上，总书记再次要求，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入研究如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疫情防控斗争的实践让人们更加懂得，越是短板弱项越是重大风险的触发点，越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中国人民将度过一个极不平凡的战斗的春天，还将继续依靠强大制度和治理优势战胜任何新的重大风险挑战，在各种大战大考中，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如何把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时代意义和创新价值

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这一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思想、主体内容、基本要求，都在宪法中得到了确认和体现，其精神实质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爱国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等，这些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

二、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世所罕见的巨大成就，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够大幅度提升，都同我们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作用是分不开的。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

三、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我们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依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来展开和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需要全国上下共同努力，需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定要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根本方向，提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水平，提高政治把握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工商联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履职能力建设，努力成为政治坚定、特色鲜明、作风优良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

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

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不断推进。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即哪些事应该由市场、社会、政府各自分担，哪些事应该由三者共同承担。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认识到了。

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共十八大对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部署，赋予人民政协更重大的责任、更光荣的使命。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十八大精神上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人民政协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八、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民族关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互助，促进民族和谐。我们要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

九、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团工作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反映了中国工会的性质和特点，是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要始终坚持这条道路，不断拓展这条道路，努力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1.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100)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在前进道路上，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又有严谨的制度安排；既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又有有效的实现形式和可靠的推动力量。这一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思想、主体内容、基本要求，都在宪法中得到了确认和体现，其精神实质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101)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仅党中央部门就集中进行了五次改革，国务院机构集中进行了八次改革，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

了重要体制机制保障。要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如果这一点把握不好、把握不牢，走偏了方向，不仅政治文明建设很难搞好，而且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害。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要保持政治定力，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2.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102）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

（10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实践充分证明，这一新型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

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继续通过这一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落实好这一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保证国家统一高效组织推进各项事业。

（10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政治协商，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协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要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着力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在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我们的民族政策都是由此而来、依此而存。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专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完善这一制度，发展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要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105）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3.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10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极大地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

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拓宽民主协商渠道，深入开展多种协商，建立健全多种协商方式，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

4.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

(107)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演进中,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

民族问题的存在是一个长期历史现象,处理民族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就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在全社会搞好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做,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多办一些顺民意、惠民生的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108) 宗教工作是一项关系党的执政前途和命运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工作。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种宗教,支持各宗教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引导信教群众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允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坚持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努力培养更多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发挥好他们在引导信教群众、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的积极作用。

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群众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要依法保障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稳步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广泛宣传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宣传宗教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宗教方面宣传舆论引导。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

5.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109) 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做好港澳工作、对台工作,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式。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的,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交朋友的面要广,朋友越多越好,特别是要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想交到这样的朋友,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要坚持讲尊重、讲平等、讲诚恳,也要坚持讲原则、讲纪律、讲规矩,出于公心为党交一大批肝胆相照的好朋友、真朋友。

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坚持党的领导要坚定不移,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加大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工作力度,帮助党外人士排忧解难。这是我们党的职责,也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思想探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治建设思想十分完整系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就要深刻把握习近平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思想的精髓要义。

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历史终结论”最早源于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88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随后,他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论文——《历史的终结?》。1989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发表了这篇文章,标志“历史终结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式提出。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就到达了终点,从此之后,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现代体制已经超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矛盾,但其他的世界角落还在追赶历史。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终结。这一论调反映了资本主义思想家的狂妄和短视。25年后的2014年底,福山在接受《时尚先生 Esquire》特约作者加藤嘉一的专访时说,中国构成了对“历史的终结”这个观念最重要的挑战,“如果中国成功化解了各种压力,并且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定的状态,那么,我认为中国确实成为了自由民主制以外一个真正的替代性选择”。其实,中国早就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早于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2018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自从‘历史终结论’提出以来，福山的预测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功——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在退缩，而是在崩溃，且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西方一些学者把欧美国家政治制度普世化，认为人类在政治制度上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凡是与西方政治制度不一致的，要么是落后的制度，要么是异端的制度。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反对这种单线式政治历史观，从不认为各个国家的发展都遵循一种政治制度模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强调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这一论断是科学的。

首先，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存在于书本中的幻象，不是现实的客观存在。美国里程碑法律基金会主席马克·莱文在2008年出版的、连续38周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自由与专制》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政府，“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政共和制，因为宪法已经并将继续受到司法寡头政治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而司法寡头政治主要执行的是集权主义章程。它不是严格意义上代议共和制，因为很多法令是由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行政部门，在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情况下制定的。……那么，美国政府的性质到底是什么？答案是，逐渐转变成集权主义的性质”。这是资本的统治，不是大众的政治。

其次，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自愿或者被逼搬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结果导致民不聊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2015年5月18日，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尖锐地指出：“搞了西方的那套东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稳定了吗？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高喊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肆无忌惮地用Tank和Bank劫掠发展中国家，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据俄罗斯卫星网2018年1月18日报道，埃及总统塞西在发表其上任总统四年的述职报告时表示，“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发生的事件造成巨大损失。一些国际评估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损失达到9000亿美元，这些事件还造成超过140万人死亡，1500多万人沦为难民”。不仅仅是在中东和北非这几个国家。放眼全球，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带来的灾难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

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没有离开国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政治制度，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一定是扎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的。而且，一个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都是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不会一蹴而就。我们经常讲一句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句话不仅仅是指罗马这座被誉为“永恒之城”的城市建筑是长期建设的结果，更指的是罗马的政治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古罗马的王政时期从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510年，共计200多年，先后经历了七任国王。公元前509年，罗马废除了“王政”，改行共和政体。共和体制经历500年的发展，到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体制又逐渐演变成帝制。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法国思想家基佐在其1851年出版的《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一书中，追溯了欧洲代议制上千年的历史。他说：“现在所出现的东西，在过去1200多年中一直在努力地展示自己。”到了现在，西方议会制度已经演变成各个利益集团相互“拳击”的舞台，人民群众的利益无人关心。西方议会制度带来的是：选举时漫天许诺、极尽夸张之能事，选举后无人过问、无人问津；选举时党争纷沓、相互倾轧，选举后相互杯葛、内耗严重；选举时人民形式上有权，选举后实际上无权。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毫无公平可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首先，这一制度生长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土壤之中。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其次，这一制度生长在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土壤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强大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把各种进步力量团结在共产党人的旗帜下。再次，这一制度生长在当代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土壤之中。40年的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强大动力，我们大大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还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40年的改革要求我们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在西方一些国家，民主被当作廉价的装饰品来敷衍人民，民主成为富丽堂皇的摆设。一些政治家高唱着民主之歌，旋律十分高亢。2001年1月，小布什在就任美国总统的演讲中说：“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自由民主的信念犹如汹涌大海中的岩石。现在它更像风中的种子，把自由带给每个民族。在我们的国家，民主不仅仅是一种信念，而是全人类的希望。民主，我们不会独占，而会竭力让大家分享。民主，我们将铭记于心并且不断传播。”“民主似乎已经成为国家的真实存在。一些西方的学者更是把理论上的民主设想当作了民主的现实。美国学者迈克尔·金斯利曾经说：“依照我们的建国文献和我们的国家神话，我们所有人都生而平等，之后则要看我们自己了。物质生活的不平等，可以通过两条途径缓解：其一，起点上的机会平等；其二，排除物质差别的公民完全平等。我们没有声称要达成所有这两个条件，但这两者正是我们的国家目标和我们一直以来不断前进的方向。”针对这一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民主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拉里·M·巴特尔斯教授，在其2008年出版的《不平等的民主》一书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个美好的看法——但它真实吗？就美国政治中的政党而言，事实远不能让人心安。”保罗·克鲁格曼更是透彻地指出，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政策都是始终如一地偏袒富人，“从偏袒富人的减税到惩罚背运者的破产‘改革’，几乎每项国内政策似乎都意在加快我们退向强盗资本家时代的步伐。”西方民主对人民而言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枷锁。

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是真实为人民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注重民主实效，从各层次各领域各方面倾听人民心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合理、更加真实、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我们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民主权力得到充分行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我们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做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这一民主制度要求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这种商量是本着制度要求的：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特定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这种商量不是走形式、走过场，而是客观真实的商量，是取得最大公约数的商量，是让绝大多数人满意的商量，不会造成“少数人欢颜、大多数人向隅”的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进行的伟大创新。这一政治发展道路所具备的旺盛生命力使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为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作出充满中国创造的贡献。习近平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思想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总结，又是这条道路进一步发展的行动指南。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哪些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哪些方面则集中暴露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在充分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稳则国家稳。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充分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领导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这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创建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国家制度，其承载的价值必然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即坚持人民至上。我们党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这次抗疫斗争，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的人民立场和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载的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习主席多次强调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增强仁爱之心，当好人民群众贴心人，及时解决群众所急所忧所盼。为了尽快遏制疫情蔓延势头、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习主席在大年初一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后又多次主持会议研究部署，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多次深入一线考察指导，把疫情防控工作抓得紧而又紧、实而又实。党和政府千方百计统筹调度全国医疗资源，力争做到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各地、各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缓解中小企业困难，推动复工复产；党和政府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保障民生，解决人民群众因疫情影响可能面临的实际生活困难，充分体现了疫情无情人有情、人民至上映初心。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国内防止反弹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必须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继续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精准落实到复工复产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不能有丝毫松懈。应继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始终把人民的支持作为我们党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在联系服务群众上多用情，在宣传教育群众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群众上多用力，坚定不移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注、最期盼的问题上，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彰显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既需要通过系统完备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来实现，同时又不断释放出推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政治效能。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将疫情防控工作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全面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不畏疫情多艰险，敢为砥柱立中流。党中央、习主席高度重视、全面加强党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疫情发生后，党中央迅速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方针政策，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并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动态调整具体部署举措；疫情防控关键时刻派出中央指导组，同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并肩战斗，有力解决了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中的紧要问题；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及时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各地区成立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挺身而出、冲锋陷阵，把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磨刀石，让党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疫情防控形势越是持续向好，越要进一步彰显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还会面临“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必须通过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来有力应对。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彰显了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提高站位看问题，配合大局作谋划，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次疫情防控斗争，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构建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充分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群策群力，迅速投入到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各地区各部门坚决服从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指挥，始终坚持以大局为重、以全局为先，明确责任，协调联动，全力奋战。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一批又一批“最美逆行者”火速驰援，白衣执甲、救死扶伤。人民军队牢记宗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践行了“若有战，召必至，战必胜”的铮铮誓言。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春节期间复工复产，加

强重点医疗物资的统一管理、统一调拨，集中送到第一线。广大科技工作者尽锐出战，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紧前开展筛选有效药物、治疗方案和疫苗研制等工作。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日夜操劳，奋斗不息。广大群众识大体、顾大局，以各自方式为疫情防控斗争作出贡献。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举国上下凝聚起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磅礴伟力。

当前，我们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仍然需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行动。展望未来，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克一个又一个“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完善统筹全局利益、统筹各方资源的体制机制，使得各项政策相互配套、相互耦合，在协调均衡中形成整体效能，从而最大限度画好同心圆、汇聚向心力。

彰显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内的科学制度体系，其显著优势涵括“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这次抗疫斗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科学有序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

依法科学有序是防控工作的支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习主席高度重视依法防控，强调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求“依法依规做好疫情防控，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国家卫健委依法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措施严格管理。在疫情防控前期，为快速遏制疫情传播蔓延，各地依照法定权限程序组织实施区域封控、人员隔离、交通管制等措施，同时依法纠正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的过头行为；疫情形势向好时，坚持依法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防止对不同地区采取“一刀切”的做法，防止不当放松防控。立起问责“风向标”，对失职渎职的党员干部，依纪依法惩处。同时依法惩治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社会稳定、秩序安定。

问题是进步的“磨刀石”。这次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卫生法治建设方面存在短板，同时也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的一次极大促进。我们要认真总结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发挥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在前进的征途上，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引领和推动全社会坚定制度自信，强化法治意识，坚决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短期内，除了继续加大力度精准控制好国内疫情、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国家经济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要尽早站在全球的角度抗击疫情。一是防止国际输入性病例；二是对全球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停滞的不确定性早做评估和准备；三是化危为机，主动支援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输出方法、技术、经验和产品，对冲国内损失，输出软实力。

长期来看，我们应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加强公共卫生软硬件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尤其是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响应机制；建设统一高效的公共卫生指挥体系，全面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增强应急救援的协同性、整体性、专业性；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确保应急物资保障有序有力；全面增强全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和能力。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突发性的灾害，我们的认识还非常有限，需要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但疫情的肆虐蔓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带来重大威胁，需要我们快速反应，科学决策。这次疫情也暴露了我国个别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提高，各地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表现参差不齐，社会反响不一，个别地方政府措施不力，造成局部区域疫情控制不力。中央和有关省市已开始调查、处置相关事件，一大批干部认真履职、成绩突出，也有个别干部能力不足、责任心不强被免职甚至追责，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吸取教训。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国家治理体系的成熟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渐进提升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疫情当前，我们应抓紧就党中央明确的国家治理特别是抗击重大灾害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查漏补缺，进行研究和部署。鼓励不断创新、勇于探索，及时对基层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进行凝练提高，不断推动各方面制度完善，提高制度的执行力，从而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扎实有效的工作。

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入研究如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赢得这次大考，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也要放眼长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这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

如何准确把握习近平强军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创立形成

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领域波澜壮阔的历程，我们党在实践上大踏步向前——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越走越宽广，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创立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新时代我们党建军治军创造的根本成就，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创立形成，是时代的产物，是一个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过程。加强对这一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等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一）

新时代呼唤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习近平强军思想凝结着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民族的强大，总是和一支强大的军队相生相存。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强国梦总是与强军梦相融交织在一起。但是，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叶，中国却因国力孱弱、军事落后而处处被动挨打。这种局面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带领人民和人民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可逆转地开启中华民族复兴图强的历史进程。

冷战结束以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深层动因，大国力量此消彼长，国际体系加速分化组合，当中国经过持续发展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迎来了一个新的拐点，正孕育出一种新的时与势。这种时与势从国际上看，就是世界面临大变局，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国际治理体系发生深刻演变，国际格局迫切需要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肩负大国责任；从国内来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车轮不可阻挡，我们正处在由大向强、从量变到质变关键一跃的紧要当口。这种时与势，从历史的纵横轴上清晰标定中国的历史方位，寓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把握浩浩荡荡的时代大势，自觉呼应复兴图强的时代主题，勇敢担起实现中国梦的时代使命，坚定地引领中华民族踏上新征程，成为新时代最鲜亮的精神旗帜。而作为其“军事篇”的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回应强国必须强军的时代呼唤，牢牢把握以强军支撑强国的时代使命、以世界一流军队支撑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考验，成为新时代在军事上的鲜明理论标志。

（二）

强军实践孕育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习近平强军思想是新时代伟大军事实践的理论镜像。“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是真理形成的一般规律。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汹涌，大国军事竞争尖锐激烈。以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为肇始，人类战争从认知框架到作战方式、制胜机理都在发生革命性改变，战争形态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加速演变，智能化战争初见端倪。经过90多年发展，我军已成为诸军兵种合成、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加快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但是“两个差距还很大”“两个能力不够”的问题仍然严峻，部队中的突出问题仍未得到彻底根治。

问题是理论的起点，也是创新理论的动力源。我军建设面临的深层问题，无疑是一个需要科学理论而且能够产生科学理论的历史环境。习近平强军思想，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分析当代中国军事问题，创造性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与规律，并用于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军兴军历史画卷，一幅幅砥砺奋进的场景，强烈地激荡人们心弦。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一宏阔历史进程既为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又使其具备鲜明的实践性，成为历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过程而逐步升华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强军思想，正是来自实践并被实践所证明、主观符合客观的科学理论，是新时代我们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

（三）

文明传承滋养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习近平强军思想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中外优秀军事文化的思想沃土。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成果，即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与这些理论成果一脉相承，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坚持我们党建军治军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坚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同时又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新发展，在重要领域、重大判断和重大观点上取得突破创新，实现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又一次与时俱进。

习近平主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素养深厚，充分汲取蕴含其中的尚武思想、战略精神、兵法谋略、治军智慧和为将之道，经常引用古代兵书战策和军事家名言，精妙的典故信手拈来、广博的引用贯通古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习近平强军思想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注重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理解强国复兴的历史使命，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把握强军兴军的时代担当，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从中华文化经典典籍撷取精辟的语言语汇，贯穿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深邃的民族智慧，展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同时，习近平主席对以美、俄为代表的大国军队重大改革举措、发展趋势了然于胸，研究深刻，并充分借鉴吸收到创新军事战略指导、深化军队改革等军事理论创新中。这些都使得习近平强军思想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充分吸纳中外军事理论最新成果，始终站在人类文明的最前沿。

（四）

领袖统帅推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习近平对于创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军事活动在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实践中占据重要而突出的位置，对军事问题的理论阐发也成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造活动最精彩、最丰富的成果之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往往从哪里开始。2012年12月8日，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后第一次离京到原广州战区视察，鲜明指出“强国梦，对于军队来讲，也是强军梦”，这一论断具有重大理论奠基意义。以此为思想发端和逻辑起点，习近平主席在领航人民军队进程中进行了艰辛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从思考回答“军队的样子”，到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进而提出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从着眼与时俱进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到领导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从着眼革除问题积弊、解决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到确立强国强军进程中政治建军大方略；从提出“三个能不能”的“胜战之问”，到明确军队的主责主业是备战打仗；从着眼设计和塑造军队未来，到发出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号召；从把依法治军纳入依法治国总体布局，到鲜明提出“建设法治军队”的重要思想；从推动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到亲自担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从关注世界大势和国家安全、分析部队吃鸡蛋和投手榴弹等现象，到阐发战争与和平、建与战的辩证法，等等，陆续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伴随强军兴军征程，习近平主席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全面、系统、深刻回答强军兴军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强军思想日益丰富完善，逐渐形成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理论大厦。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历经从重大论断到思想体系的升华，既是理论发展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更是理论创新自觉自为的过程。其中，习近平作为党的领袖和军队统帅，始终担任理论创造的“第一小提琴手”，回应强国强军对创新军事指导理论的时代呼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创立形成，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壮丽日出，为新时代推进强军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历史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制定新形势下系列军事战略方针，全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全力推进建设世界一流人民军队，发展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强军思想传承了毛泽东“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根本原则的思想精髓

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把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同中国革命实战相结合，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著名论断，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号召人民“为建设强大

的国防而奋斗”，形成博大精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而这其中，他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

1929年3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入闽作战。同年12月在上杭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要求加强红军内部各级党组织建设，使党的组织确定成为“领导的中枢”、“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决议》创造性地提出“使党员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古田会议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理论和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系统地回答了党和军队建设一系列带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对于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从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汲取营养。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多次在部队、在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相关机构兼任过领导职务，包括福建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福建陆军预备役高炮师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福建省委武装委员会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等。习近平同志曾先后七次到古田会议所在地瞻仰和考察学习。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后，尽管地方工作异常忙碌，习近平同志依然牵挂部队，尽心尽职，要求自己做到“三个坚持”：每次需要第一政委参加的活动他都坚持到场；每当需要第一政委“拍板”的时候他都坚持作出明确指示；预备役部队的重要情况他都要坚持听取汇报。从预备役部队的高炮编组、作战方案的拟定，到部队的训练、基础建设等各个方面，习近平同志都有很多具体的指示和要求，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强军思想，为建设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强军目标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古田，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他重申古田会议确立的军队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强调“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他明确指出，“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是要重温和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就是要“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再次强调了全军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针，提出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要重点抓好的五个方面：“着力抓好铸牢军魂工作，着力抓好高中级干部管理，着力抓好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抓好战斗精神培育，着力抓好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根本原则的忠实传承，为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凝神聚力、指明方向。

习近平强军思想升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队建设理论的科学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军队建设理论。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队建设的理论发展。2002年1月，他在福建预备役高炮师党委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严格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狠抓落实。”2002年8月又进一步强调，“要把‘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作为最高的政治要求，确保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他指出：“预备役部队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武装，一定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在任何时候都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责任为责任。”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全会上强调：“军魂的本质就是‘高举旗帜，听党指挥’，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党和人民对我军的最高政治要求。要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政治上坚定，思想上先进，道德上纯洁，永葆我军政治本色。”

习近平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后，多次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多次引导同志们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习近平同志还在多个场合指出：“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坚持从政治上考察和使用干部，使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习近平同志始终以党和军队发展壮大的深邃历史视野审视当下和未来，为新时代党和军队政治建设作出了新总结和新论述。

习近平强军思想奠定了新时代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理论根基

当今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战略格局、全球治理体系、全球地缘政治棋局、综合国力竞争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发展前行中的阻力和压力也在增大，周边安全风险呈累积态势，军队内部出现郭伯雄、徐才厚等重大违法乱纪案件，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健康肌体。人民军队建设迫切需要一场革命性变革。

实现人民军队的革命性变革，首先需要的就是增强人民军队的革命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首位，使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官兵思想中深深扎根，确保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和发展，指出“要在发扬光大优良传统基础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增强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感召力”。2016年初，他在接见驻渝部队领导干部时指出，“要努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新一代革命军人，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这一重要论述赋予了人民军队优良传统新的内涵，成为人民军队更加坚定自觉地贯彻政治建军要求的落脚点和基本要求。

在新时代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以巨大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密集打出强军“组合拳”。牢牢抓住“军强才能国安”的历史规律，鲜明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更加注重军事力量综合运用，军队要履行好“四个战略支撑”使命任务，以有力有效的军事行动确保国家战略全局主动；着眼于设计塑造军队未来和抢占未来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把军队改革上升为党的意志、国家行为，领导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立起“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总基石；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进行总体设计，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强调坚持“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的强军布局；提出全面推进军队“四个现代化”，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把新时代军事战略思想立起来，把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立起来，把备战打仗指挥棒立起来，把抓备战打仗的责任担当立起来。”“全军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安全和发展大势，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扎扎实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习近平强军思想有根有魂、有本有源、有发展有创新，既立足于当代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变化新实践，又延续了古田会议以来我党我军发展壮大的宝贵经验，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问题，必将在新时代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进程中，发挥巨大的理论力量和实践力量。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要义

“习近平强军思想”回答了什么时代命题？

这一思想立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于新时代国防和军队鲜活实践，深刻回答了强军兴军的使命任务、目标方向、原则制度、根本指向、战略布局、重要路径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是一个逻辑严密、意蕴深远的科学军事理论体系。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主题

强军兴军习近平强军思想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大领域，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军队和地方两大部门，涵盖战争指导、建军治军和改革创新等各方面，打通建设、指挥、管理、监督等链路，是一块成型的“理论整钢”。“十个明确”紧扣“强军”渐次展开，充分反映习主席对“强军强什么、怎么样强军”的深邃理论思考。

习近平强军思想蕴含的理论精髓

求是求实习主席建军治军的最大特色是求是求实、知行合一。习主席敏锐洞察新时代军事领域的矛盾运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军事问题，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的强军之道、制胜之道，丰富发展了我们党的军事辩证法。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时代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强大民族必须有强大军队的支撑，强大军队必须有强军思想的引领。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紧围绕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这一课题，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开拓了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党的十九大明确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把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党章，实现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了根本引领和科学指南。

党领导人民军队进行伟大军事实践的宝贵结晶。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任何思想理论的诞生都离不开时代的需求。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习近平强军思想就是军事实践内在诉求的时代回应，是应对时代机遇和挑战的思想结晶。**过去一个时期，军队一度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这种状态任其发展下去，军队不但打不了仗，甚至有变色变质的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中，全面把握国际国内大势，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卓越的政治智慧，领导全军重振政治纲纪、重塑组织形态、重整斗争格局、重构建设布局、重树作风形象，人民军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强军兴军的过程中，党的军事理论创新与军事实践创新同步发展、相互激荡，党的军事理论创新引领伟大军事实践，伟大军事实践孕育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军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新时代建军治军奋斗创造的根本成就。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时代化的新飞跃。坚持用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指导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建军治军的一条基本原则和根本经验。在长期实践中，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创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与这些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当代中国军事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职能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和政党关系的基础上，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性质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揭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三个必胜”战争规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发展动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的观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战斗力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把战斗力作为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等等。这些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重大创新、重大发展，深刻阐明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和强军的奋斗目标、建设布局、战略指导、必由之路、强大动力、建军方式、发展路径等重大问题，把党对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凝结着“时代精神的精华”，升华了党对军事指导规律的认识，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发展新境界。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根本引领。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党的十九大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的战略目标。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是引领未来的旗帜。习近平强军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也是全面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科学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根本在于习近平主席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指引。**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军事篇”，习近平强军思想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筹划和设计，置于夺取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中考量和把握，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来运筹和谋划，把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纳入强国复兴大战略、大布局，擘画了未来几十年军队建设发展的蓝图，对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战略安排，描绘了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总目标和路线图，犹如大海中的一座灯塔照亮了强军征程，为人民军队攻坚克难、爬坡过坎、开拓前行提供了思想引领，是人民军队在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中勇立潮头、赢得战略主动的科学武器，是人民军队的强军之道、制胜之道，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行动指南。

如何理解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核心要义和重要地位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十个明确”。

强军使命明确强国必须强军，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

强军目标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必须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强军之魂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人民军队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强军之要明确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必须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全面提高新世代备战打仗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强军之基明确作风优良是我军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必须加强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大力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

强军布局明确推进强军事业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全面提高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

强军关键明确改革是强军的必由之路，必须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强军动力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统筹推进军事理论、技术、组织、管理、文化等各方面创新，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

强军保障明确现代化军队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强军路径明确军民融合发展是兴国之举、强军之策，必须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重要地位

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军事篇”。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对于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乃至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强军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习近平强军思想，深深植根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加强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丰厚土壤，是在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迈进新时代中体现出强大真理魅力和巨大实践威力的科学理论。5年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导下，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得到有效治理，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军事斗争准备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习近平强军思想就是这一系列强军实践的理论结晶，是新时代人民军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强军思想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一个主题鲜明、逻辑严密的科学军事理论体系。这一思想，精准回应了中华民族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使命召唤，深刻回答了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重大问题，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体中华儿女强国强军的殷切期盼；它贯穿强军目标的思想魂魄和逻辑主线，与时俱进发展党的军事战略指导，创造性地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明确了统揽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纲；它将新发展理念运用于国防和军事领域，强调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确立了军队建设发展的战略指导；它坚持统筹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和依法治军，强调聚焦备战打仗锻造精兵劲旅，明确了强军战略布局和军队的根本职能、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它要求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坚定了强军兴军的战略依托。

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创了中国军事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从理论层面看，习近平强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它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同当代中国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客观实际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和军事问题的基本观点同新的战争形态与制胜机理结合起来，把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建军治军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与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指导的时代需求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从实践层面看，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深刻阐明了强军兴军的历史方位、目标布局、理念思路、发展动力、战略举措、根本保证等，为我们攻坚克难、开拓前行提供了强大思想保证，为铸魂励志、凝魂聚气立起了精神旗帜。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只要我们高擎习近平强军思想伟大旗帜，人民军队就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新业绩。

习主席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请你谈谈对这一论断的认识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是攸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是思考筹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逻辑起点。

习主席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这科学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矛盾特征，为我们认识新的时代条件下战争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丰富和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和平必须以强大实力为后盾，能打赢才能有实力遏制战争，才能确保和平**。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提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这些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下去，永远不能动摇。我们渴望和平，但决不会因此而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会拿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我们决不干称王称霸的事，决不会搞侵略扩张，但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能决战决胜。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在国际较量中，**政治运筹很重要，但说到底还是要看有没有实力、会不会运用实力。有足够的实力，政治运筹才有强大后盾，光靠三寸不烂之舌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因为我们高度重视国防建设，敢于在关键时刻亮剑，才顶住了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安全、尊严。现在，虽然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和选择增多了，我们可以灵活运用、纵横捭阖，但千万不能忘记，军事斗争是国家政治和外交斗争的坚强后盾，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的手段。把军队搞得更强大，这样底气才足、腰杆才硬。

如何正确理解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以及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确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从新形势出发对人民军队重申的重大政治原则，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

第一，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科学论断，使我们对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在当今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必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拥护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第二，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人民军队是国家政权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时的讲话中指出：“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民军队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极端重要性。一个时期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其险恶用心就是切断我们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切断人民军队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力量支撑和武装保障。对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更加强化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优势，让人民军队更加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第三，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是否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力量。“90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才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并领导这支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成为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正是紧紧围绕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引领，坚定不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实现了全军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开创了强军兴军新局面。

中央军委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是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在一整套军事制度中居于核心和统领地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军队要重整行装再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首要也是关键的一条，就是必须把贯彻执行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最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来遵守。

党的十九大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提出的“8个明确”之一，就是“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反映了国家安全环境深刻变化和时代发展对军队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对人民军队建设战略目标的重大创新发展，为新时代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目标指引。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郑重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大法，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体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我们要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切实贯彻落实宪法要求，进一步深刻认识习近平强军思想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指导意义，牢牢把握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一、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一重要思想，拓展了强军视野、提升了强军目标、丰富了强军内涵，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引领。

标定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全新的目标定位。党的十九大在继续强调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基础上，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纳入强军目标内涵，进一步提升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目标。一方面，这个目标要求军队发展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强国必须强军，强军目标必须适应强国目标的拓展。党的十九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蓝图，与此相适应，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融入强军目标，就是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呼应。另一方面，这个目标以世界一流强国军队为参照。提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要求我军不仅要赶上世界军事发展潮流，而且要走在前列，引领潮流，实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立起了军队建设的新目标、新视野、新蓝图。

确立了新时代推进强军事业的时代主题。目标是全局之纲、全局之魂。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明确了加强军队建设的聚焦点、着力点和目标点。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立起到本世纪中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围绕这几个方面下功夫，建军治军就能秉纲执本、纲举目张，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解决我军“两个差距很大”“两个能力不够”等突出矛盾问题。可以说，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就是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强军事业的时代主题。

提升了为强国复兴提供战略支撑的标准要求。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与国际阻力加大并存，接近奋斗目标与风险挑战增多并存。毋庸置疑，我们不会走近代以来有些国家曾经走过的国强必霸的老路，坚持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实现强国复兴，但强大的军事实力仍然是战胜各种危机和挑战不可或缺的力量保证。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党的十九大作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战略安排，鲜明指出到2020年、2035年、本世纪中叶强军兴军应该达到的发展水平。一步步实现这些战略安排，就能够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铸造成坚强的战略支撑，使国防和军队建设成为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使军事手段成为高质量的保底手段。

二、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立意高远、内涵丰富，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强军、强军目标是什么、怎样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这个重大课题，为推进强军事业立起了风向标和导航仪。我们要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深刻把握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科学内涵。

建设能够适应强国强军时代要求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综合实力将持续稳健增长，国际地位将显著跃升，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所需要的军事力量也必须不断增强，这样才能确保强军进程与强国进程相适应、相协调。从这个意义上看，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就是要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利益相适应、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升级强军的标准。与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相同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也都有了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听党指挥，就要按照绝对的标准固根铸魂，深挖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子，铸就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坚决维护权威、维护核心，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能打胜仗，就要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作风优良，就要全面从严治军，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落实《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军委十项规定、《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等。有了这些新内涵作支撑，我们就能确保新时代国防巩固、军队强大。

建设能够担当起新时代使命任务的强大人民军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人民军队所创造的伟大历史功勋，都是在履行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使命任务中取得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赋予人民军队新使命。习主席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坚持把强军事业放在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中来考量，放在我们党戮力复兴的执政使命中来把握；要求人民军队“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强调我军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需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要体现到贯彻落实这些指示要求、完成好这些使命任务上来。

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和路径是互为一体的。强军目标是强军之路的目标引领，强军之路是强军目标的实践形态。从实践和路径这个层面看，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就是要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围绕这一强军伟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强军兴军的基本方略，即“14个坚持”中的“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并把“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作为强军兴军基本方略的压轴之笔。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强军兴军的宏伟蓝图，提出了相应的目标要求，强调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

武器装备现代化,并对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以及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作出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实好这些战略部署,就能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三、坚定不移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不懈奋斗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宏伟而艰巨的事业,还有不少重大挑战需要有效应对,还有不少重大风险需要坚决抵御,还有不少重大阻力需要努力克服,还有不少重大矛盾需要强力解决。必须强化战略定力,始终不渝地艰苦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庙算制胜,理论先行。91年来,人民军队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习近平强军思想,以一系列新的重大判断、新的理论概括、新的战略安排,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党对军事指导规律的认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发展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必须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作为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更加自觉地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真正立起统领部队建设的“魂”、指导工作的“纲”,做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执行者、模范践行者。要持续兴起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学习热潮,跟进学习习主席最新讲话精神,全面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思想体系和精髓要义,切实掌握推进强军兴军的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要在体系学习、举旗铸魂、知行合一、转化运用上下功夫见成效,切实学懂弄通做实,更好地夯实官兵兵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的思想政治根基,更好地形成与推进实现强军目标相适应的政治定力、理论功力、工作能力。

推动落实强军兴军战略布局。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是立军之本、必由之路、核心驱动、基础保障的有机统一,是强军兴军的战略布局。新时代推进政治建军,就要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推进改革强军,就要继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化军官职业化制度、文职人员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推进科技兴军,就要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推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加强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推进依法治军,就要全面从严治军,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聚焦备战打仗锻造精兵劲旅。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必须坚持一切工作都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贯彻和体现到各领域全过程,使广大官兵把准备打仗变为自觉行动。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认真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把握现代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扎实做好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全面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加强军事力量运用,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构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必然选择。要树立一盘棋思想,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推动工作,坚决防止和克服阻碍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不良问题和倾向。要加强战略引领,加强改革创新,加强军地协调,加强任务落实,同步推进体制和机制改革、体系和要素融合、制度和标准建设,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努力开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新局面。

如何认识人民军队在新冠“总体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围绕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总体战无疑是中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内容,而解放军在这场全国动员的人民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虽然与真实战争不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解放军在类似的大规模战争情况下的动员与保障能力。

“总体战”中的人民军队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爆发于武汉与湖北一省一地的疫情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扩散,中国政府抗击疫情的活动也从单纯的“全国支援武汉/湖北”转变为全国范围内打响的一场人民战争,同时也成为一场考验中国综合国力的总体战。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的武装力量主体——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责无旁贷地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来。作为人民子弟兵,这种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战斗,从人民军队创立之初就作为一种职责被刻入了解放军的骨髓之中。

但不同于传统的抗洪抢险或者抗震救灾,与看不见的病毒进行的战斗所需要的并不是单纯精力充沛、组织充分、纪律严明而数量庞大的青壮年体力劳动力量,而是医术精湛、经验丰富、防护严密、专业知识俱全的医务工作者,以及数量充足、质量过硬的各种医疗设备与药物。对于防疫工作而言,防疫一线的医生和护士就是拼杀在战场的指战员,各种口罩、面罩、防护服就是他们的钢盔和防弹衣,医院的病房和手术室就是他们的阵地,各种医疗设备就是他们的枪炮战车,各种药物等医疗物资则是他们与病毒较量的弹药补给。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有着200万人的庞大员额,但其中能够走上医疗战场的医务工作者数量依然是相当有限的,目前直接投入到武汉防疫一线的解放军医务人员,主要包括来自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援鄂医疗队150人,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150人,空军军医大学医疗队150人。

这几支医疗队先是在1月25日前后前往武汉的对口支援医院(金银潭医院、汉口医院和武昌医院),接管相关科室病房,随后又在2月2日与联勤保障部队抽组的950人进行统一编组,接管武汉火神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科医院,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除此之外,解放军在武汉的医疗力量也已经投入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工作中,而其他全国各地的解放军医院也抽调精干力量前往湖北进行对口支援.....相比全国驰援武汉的11000多人的医护人员总数和武汉本地约4.23万名执业(助理)医师的数量,解放军医疗人员的数量在绝对总数上并不算少,其所处的位置也是最危险、难度最大的第一线工作,是武汉地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一支重要力量。

除了医疗人员外,解放军部队也在武汉抗击疫情所急需的各类物资运输上起到了相当的作用。2月2日,空军出动8架大型运输机,从沈阳、兰州、南京、广州四地出发,运载795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58吨物资,于当天上午9时30分全部抵达武汉天河机场。这是继汶川、玉树抗震救灾之后,空军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同时出动大型运输机数量最多的一次。

相较于各种地面机动方式或者协调民航力量进行分散运输,动用空军编制内的大型运输机进行人员和物资的输送所需的工作环节更少,效率更高,运输速度也更快。有不少人因为这次只出动了伊尔-76运输机而没有动用我军最新服役的运-20系列大型运输机,便开始怀疑后者的状态,虽然这样的推论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在救人要紧的战时,优先出动稳妥可靠的战斗力执行任务无疑是最为科学的做法。

相比于大手笔的多架运输机集体出动运输人员物资,在武汉市内一直执行运输支援任务的汽车运输部队就要默默无闻得多。2月1日成立的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共有130辆军用运输车、260多名任务官兵。这支运力支援队根据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每日派遣人员、车辆装载物资,送往武汉三镇200多个配送点。

这支以军用卡车为主体的运输队的规模和运力都不足以承担武汉三镇上千万人口日常所需的天量物资的运输任务，更多的是作为一支补充力量和预备队，对武汉市内各大区域内的物资进行应急调配。从组建一周以来支援队运输过蔬菜、大米、杂粮、医疗器械、医院用品、床架、被套等各种物资的繁杂程度来看，虽然规模较小，但其对于武汉内部的有效保障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武汉疫情爆发以来，有关解放军防化部队应该出动的呼声在民间舆论场上一直没有间断。毕竟在一般的印象中，处理“核、生、化”污染的“三防”是防化部队的重要职责之一，但无论是对各种人员装备的洗消，还是对各类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战场防护或者对各类作用时间短但是杀伤效果强烈的化学毒剂和生物武器的消毒和消除沾染活动，与在城市环境下对日常环境的洗消和防护都是完全不同的。

加上当代防化兵在现代战场上除了实施核观测、化学观察和化学、辐射侦察，实施剂量、沾染检查，实施消毒和消除沾染等职责外，还有大量实施烟幕保障，并以喷火分队直接配合战斗的其他任务，与要求丰富医疗卫生知识的防疫工作相比较，除了防护器材相对到位外，防化部队很难在救治病人上做更多的工作。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加上全球化进程深刻的传播、扩散、冲刷作用，使得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世界多极格局在大国博弈中日渐显现，国际体系在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不断蜕变中正呈现新的面貌。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判断：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这一“变局”的丰富内涵，牢牢把握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重大机遇，是新时代开拓广阔发展空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现实要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重塑世界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兴起是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和世界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的发展面貌和基本格局。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几百年里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超过过去几千年科技创新成果的总和。特别是18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几次重大科技革命。在科技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发生多次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解放和人们生活水平实现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其主要特点是：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这对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将变得更加突出，将给世界带来无限发展的潜力和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作为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层面的因素，科技和产业的变迁是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演进最根本的动力，大国的兴衰和不同形态文明的起落都在反复演绎这个逻辑。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走上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抓住第二次产业革命机遇，成为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领航者和最大获利者，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这种态势至今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中国在古代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等众多科技领域曾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近代以来，中国错失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逐渐由领先变为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正处于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当前，各主要国家纷纷出台新的创新战略，加大投入，加强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力求抢占科技和产业革命高地。中国既面临着历史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就一定要解决好科技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推进科技向产业转化，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升全球治理加快变革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自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以及商品、产业、信息等开始在世界某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自由布局，区域内的联合和一体化程度以及世界的关联性和整体性都逐步提升。冷战结束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促成了商品大流通、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资本大重组、技术大发展、人员大流动，形成了包括越来越多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在这个历史性进程的长期作用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更充分的发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构建实现了联动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和释放，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向前发展，不同地区、国家、产业、群体将经受不同的冲击。加上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灾害、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移民难民等全球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将使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变得越来越突出，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消解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健康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紧迫。面对这种加强全球治理的强烈需求，中国展现大国责任担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创造性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中国方案”和积极打造“一带一路”建设这个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积极倡导兼顾全球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变革。

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

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国际格局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集团对峙较量状态。冷战结束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世界权力从一个中心向多个中心扩散、各中心之间力量差距逐渐缩小，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多极化趋势逐步发展。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多极化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不断扩展，向全新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深化，使国际力量对比总体上变得越来越平衡。

从全球范围看，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如今，按汇率法计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所占比重接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如果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这将使全球发展的版图变得更加全面均衡。以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协调，推动提高自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在联合国、“金砖+”、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多边框架下持续增大影响力，促进南南合作，

扩大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此外，东盟、非盟等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也在推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国际影响。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历史性的甚至是难以逆转的变化。

大国战略博弈加剧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

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比看，冷战结束后的失衡态势明显改变。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多强”之间国际地位变化的均衡化趋势日显突出。英、法、德、俄等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在下降；俄罗斯则在经济实力下降背景下，继续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突出地位；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均在上升。其中，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高尤为显著。这不仅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成为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并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越发平衡的重要因素。

面对不断深入展开的多极化趋势，特别是国际混乱失序因素明显增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持续高企的全球环境，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纷纷重新厘清自身定位、资源条件、内外战略，力求更好地因应变局、维护利益、确保安全，在日益显现的多极格局中抢占比较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就使得大国的战略取向和政策推进普遍呈现强调自主、推陈出新、强势进取的特点，大国关系的合作面明显下降、竞争面明显上升，而且竞争日益聚焦于重塑国际规则。当今时代，世界各国正通过以制度创新和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为支撑、以重塑国际规则为主要手段的竞争博弈来重新划分利益和确立彼此地位关系，国际体系的变革愈显深刻。发展模式 and 道路多样化趋势越发凸显。全球地缘战略角逐的中心舞台从欧洲转向印度洋—亚洲—太平洋板块。军事战略之争从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代表的传统战略威慑能力，向太空、网络、海洋、极地等新领域和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等新技术维度扩展。国际规则重构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展开。国际社会在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的思想理念，创建新的国际规则、体制、机制，这将进一步催生新的国际体系。

总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加上全球化进程深刻的传播、扩散、冲刷作用，使得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大国在因应这些世界大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顺势而进者走强、逆势而动者走弱，并依据实力地位消长和驾驭国际规则的水平而重新排列组合。世界多极格局在大国博弈中日渐显现，国际体系在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不断蜕变中正呈现新的面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貌如此。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从大历史和国际关系多重矛盾复杂演变的角度加以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乃多对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呈现为六个方面，包括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国际体系主导权、国际关系行为体、世界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国际秩序的深刻重塑，多次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且强调“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从大历史和国际关系多重矛盾复杂演变的角度加以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乃多对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呈现为六个方面：

其一，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东升西降”，“东西矛盾”由过去的“西强东弱、西主东从”转向如今的“东西平视”，这堪称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持续走强，其人口规模、地理版图、资源潜力均全球领先，中国倡议的“亚洲文明对话”助推东方文明复兴。IMF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衡量，2019年亚洲GDP的全球占比为34%，而美国与欧盟合计占比为31%；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3%，美国为11%，欧元区仅为4%。“世界经济论坛”载文指人类已迎来“亚洲世纪”。世界史学界公认西方自16世纪（1500年）起开始赶超东方并领先全球，故当今“东升西降”可谓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欧盟等各大力量纷纷对亚洲加大投入，致使亚太乃至“印太”地缘角逐持续升温。

其二，国际体系主导权“南升北降”，“南北矛盾”由过去的“北强南弱、北主南从”转向“南北对等”。世界力量对比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难以逆转，老牌与新兴大国综合实力此消彼长仍是大势所趋。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虽面临困难、但仍总体前进，以中印等“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走势虽有分化，但仍群体性崛起。与此同时，老牌发达国家政治与社会困境加剧，美国阶层与族群矛盾凸显、政党对立、社会撕裂，欧盟离心力增大，日本老龄化严重，西方七国集团（G7）影响力式微，体现新老大国共治和“南北共治”的二十国集团（G20）影响增大。

其三，国际关系行为体“非（国家）升国（家）降”，这堪称近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行为体从主权国家“一统天下”，朝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的方向转变，全球治理尤其如此。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影响力上升，高科技公司富可敌国、能量惊人。当代国际体系源自1648年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国家从此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故当今“非升国降”可谓近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四，世界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动能“新旧转换、新陈代谢”。新技术与新工业革命持续发力，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量子计算、无人化等日新月异，跨界融合、质变突破、叠加飞跃势头迅猛，其在更加方便与造福民生的同时，也蕴含人员失业、安全失控、伦理失序的风险，人类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面临颠覆性挑战，大国高科技竞争更是空前激烈。

其五，中西互动趋于“平起平坐”，“中西矛盾”与力量对比由过去的“西强中弱”“西攻中守”转向如今的“中西互有攻守”，这堪称一百年和近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稳健迈向民族复兴的中国并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最大变量”，因为中国的崛起及其建设性正能量是确定的，中国实乃大变局的主要“推手”，也是大变局的最大亮点。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其导火索是西方列强达成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凡尔赛条约》，中西方关系从当年中国任人宰割到今天“平起平坐”，可谓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如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起算，中西方从过去的“西强中弱”，及至1949年中国“站起来”，发展到今天中国正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中西方实力对比渐趋均衡，这又可谓近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六，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与美国单边主义共同作用，令全球治理供给严重不足，“治理赤字”明显增大，“供求矛盾”凸显。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当前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泛滥成灾，鼓吹“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更是大开倒车，对外大搞保护主义，使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所确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与多边主义，以及冷战后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都面临“逆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这也堪称战后和冷战后未有之大变局。

周力：必须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中国因素和世界因素统筹起来考虑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是今年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关心，世界人民关注。在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疫情在世界范围内长时间挥之不去、各国复工复产复学深受影响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稳如泰山，凝心静气，牢牢控疫情，抓紧复工复产，修复产业链、供应链，推动经济社会生活走上正轨，尽全力完成“十三五”规划中规定的各项任务，彰显了我们的制度优势。习主席说，这次疫情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我们要举一反三，进行更长远性的思考，完善战略布局，做到化危为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这就是五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所在。

为什么说这是在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呢？我觉得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到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划上圆满的句号。“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再跃新的大台阶。而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要打好防范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这“三大攻坚战”，其中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最具重要意义。它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对此，要做好总结和收尾工作，一鼓作气走完“最后一公里”。

第二，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的战略安排，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还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们即将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作出新的部署。

第三，面对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总体形势，中国今后要能依然保持经济以较快速度、较高质量持续发展，必须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中国因素和世界因素统筹起来考虑；必须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统筹起来考虑；必须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同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统筹起来考虑；必须坚持底线思维，趋利避害，迎难而上。

第四，各方面各领域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愈加明显和突出。在当前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共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的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聚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展现出了谋划未来的责任担当和继往开来的历史担当。

2

这次全会作出的一个前提性的首要判断，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又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是我们迈向新征程所处的基本态势。尽管目前国际社会遇到许多新威胁新挑战，尽管单边主义、霸凌行径仍在肆意妄为，但世界呼唤和平，呼唤正义，呼唤发展，呼唤团结。中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经济长期向好，市场空间广阔，社会大局稳定。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创新能力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等等。我们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会议重点研究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并提出建议，同时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衔接起来，对中国未来五年以至更长时间经济社会发展的近期目标和远景目标、相应的战略部署、所涉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将要实施的重大举措等等，都一一作出了明确的有针对性的安排。所有这些，对全体中国人民继续勇往直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无疑是一种有益、必要的动员和激励。

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坚持扩大内需作为发展的战略支点，是未来五年规划最大的亮点。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新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它一方面要求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开辟经济纵深，把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和高质量供给创造、带动新的需求，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另一方面要求进一步对外开放，包括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创新贸易发展形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等等多个方面和领域。

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大搞保护主义，不断退群毁约，加之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遇到前所未有的阻碍。我们一贯认为，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其存在和发展与否，并不以某个国家或者某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历来坚定不移地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新形势下中国对接和联通全球化的新方法与新手段，是党中央科学应变作出的战略抉择。我们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在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着力释放内需潜力，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同“一带一路”建设、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进行。“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我们愿为推动人类实现持久和平、进步与繁荣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3

值得注意的是，全会公报中还特别提及要“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那么，新矛盾和新挑战到底有哪些呢？这里仅举几例。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秩序形成强大冲击。美欧等发达国家全部成为疫情重灾区，政府束手无策，到处推卸责任，甚至拿所谓的“群体免疫法”来糊弄、欺骗人民，以致那里的工业生产极度萎缩，生产停顿又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对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两端都造成严重影响。绝大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因此而瘫痪、断裂，并波及到全球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其危重程度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场经济危机。更有甚者，美国动辄挥舞单边制裁大棒，实施长臂管辖，鼓吹“脱钩”，围堵打压别国企业，人为切断世界资金流、技术流、产业流、人员流。

二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及相应的霸凌行径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美国在不断破坏甚至试图扼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威胁广大中小国家安身立命之本。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因特朗普政府违反世贸规则而陷于瘫痪。近百个国家采取不同程度的出口限制措施，间接助长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一些国家的双边或小多边贸易安排也冲击多边贸易体系。一些极端政治势力则重拾“冷战思维”，不遗余力地挑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意欲把世界推向分裂和对抗的危险境地。与此相反，绝大多数国家更加支持多边主义，要求对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国际公共卫生和多边贸易体系进行变革，以最大可能实现国际公平与正义。各方围绕如何改变现行国际规则而展开的斗争日趋激烈。

三是全球面临的安全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传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流行病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明显上升。数据安全成为国际社会近来普遍关心的问题。军事科技和新的战争形式的发展，使各国在网络、外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防范与竞争大大加剧。适应新形势下的安全秩序观和安全治理模式亟需改变。

四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呼唤新的动能。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高科技手段的发展与应用，在加速推进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到来。而这势必引发世界主要经济体实力的重新洗牌。显然，谁能抢占先机，谁就能取得领先地位。仅华为5G技术一项在世界上推广遇到的强大阻力，就足以说明，世界各主要力量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新的布局展开的博弈有多么激烈。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上述新矛盾新挑战，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冷静观察，准确把握，迎难而上，按照党的十九大以及历次全会确定的精神和部署，在对外工作中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在生存和发展问题上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无论推动发展建设，还是治理体系改革，亦或应对风险挑战，都需要汇聚全球资源，汲取各方智慧，形成强大合力。要让各国都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第二，加强大国协调合作。倡导大国发挥表率作用，带头践行联合国宪章，带头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带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在世界面临重大风险挑战的时刻，大国更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要，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同舟共济，携手应对。

第三，维护国际法秩序。完善全球治理格局，必须树立法治意识。强调恪守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有约必守、有诺必践。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推进深海、极地、网络、外空等新兴领域法则制定，确保新疆域开发有法可依，公平惠及每个国家。

第四，发挥好联合国的核心作用。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机构，比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更有资格和优势发挥领导作用。联合国自身也要与时俱进，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高运行效率和应急能力，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安理会作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新形势下，安理会要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给世界和平以保障，给国际秩序以稳定，给各国人民以安全，给全球治理以希望。

第五，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我们要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作出更多的努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疫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动力。科技创新是应对疫情、实现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呼吁各方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利用疫情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复苏”。

第六，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当前尤要把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置于国际议程中更加重要的位置。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牵涉方方面面，需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抗疫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为什么要有效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推进。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接续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越来越紧迫的任务，要清醒认识其重要意义。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随着90%以上的贫困县退出摘帽和贫困人口脱贫，我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和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余下的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两州”贫困问题也即将解决，工作重点转向全面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提升脱贫质量，增强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认真总结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成就，提炼各地好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把行之有效的扶贫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全面推广并进行延伸，特别是将一些业已成型的做法制度化、规范化，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也为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提供可持续动力。

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农业、农村、农民始终是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恒久话题，中国还有近六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贫困人口也主要集中在农村，生产力落后、生态环境恶化、治理效率低、人口过度流失、老龄化加剧等问题仍然存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中国城镇化率从1995年的29%飙升至2019年的60.60%，而农村人口从1995年的8.6亿下降到2019年的5.5亿，整整3亿人离开农村，农村人口愈发凋零。失去青壮年支撑的农村，只留下不愿离开的老人、不愿离开的妇女、不能离开的儿童，农村被“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占领着。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成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细化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强化了“两个一百年”的战略安排，明确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脱贫攻坚消除了绝对贫困，但离富裕还有很长的距离，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就是使近六亿农民通向富裕之路的一个有效措施。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所对应的时间段不同、侧重点不同、机制不同，但二者的根本目标一致，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进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只有二者有机衔接，才能不断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基础

在脱贫攻坚收官之际和乡村发展中两大战略任务接续的关键时机，要实现贫困地区持续脱贫和全面振兴，并不能仅仅要求支持政策不变或支持力度不减，而是必须加快完成从应急性政策取向向长期性政策设计的重大转变，当务之急是找到二者的共同点和差异，通过政策内容和实施方式的合理调整，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有效衔接。

两大战略具有共同点。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接续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我国高质量脱贫的重要路径，更是贫困地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制度保障。

首先，二者目标一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定的国家战略安排，脱贫攻坚重点通过大规模资金、物资、人力等扶贫资源的集中投入，有效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乡村振兴通过总体性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能够为贫困群体提供更稳定的发展基础和机会，进一步有效巩固脱贫攻坚的政策成果。二者目标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致，战略目标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衔接，不断提高，逐步深化，体现了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其次，二者内容共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都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从产业发展、移民搬迁、基础设施改善、乡村治理、民生保障以及体制机制构建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比如，发展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既是产业扶贫见实效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必然选择，都致力于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户享受更多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的有效手段，同样也是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分类推进乡村建设，统筹解决村民生计、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保等问题的重要形式。教育、医疗、住房及最低生活保障兜底脱贫，本身就是乡村振兴战略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指标。

再次，二者主体相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农民是脱贫攻坚的主体、项目实施的主体、收益共享的主体，而政府则是帮扶的主体、社会动员的主体和脱贫责任的主体；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是乡村振兴

的主体，即意愿出自农民、动力来自农民、以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强调能力建设，激发农民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他们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两大战略实施都离不开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

最后，二者机制互促。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实施，都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制机制来保障。脱贫攻坚的成功，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和体制机制创新，比如形成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构建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定点扶贫机制和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展现出了巨大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这些都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工作基础和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领导是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转化、吸收、嫁接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引导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功。

两大战略具有不同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同属于时空禀赋的资源配置，既存在时间维度的先行后续关系，又存在空间维度的交叉重叠关系。这种双重维度的协同关系体现出两大战略不同的政策着力点。二者还存在很多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二者的优先任务与顶层设计有别。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具有紧迫性、优先性、阶段性等特点。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坚持现行扶贫标准，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不折不扣加以完成。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七大战略之一写入党章，是在把握工农城乡关系演变规律的基础上，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顶层设计。要在乡村振兴这一顶层设计中，突出重点、集中发力，确保优先任务率先完成。

第二，二者的标准有别。脱贫攻坚的时间到2020年，标准是“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标准在于彻底改变千百年来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第三，二者针对的对象有别。脱贫攻坚战略的对象是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这一特定群体，聚焦在建档立卡贫困户，着眼于贫困地区这一特定区域。脱贫攻坚的目标群体是既定的、明确的、有严格标准的，扶贫政策在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有严格的执行界限。乡村振兴强调通过普惠性支持促进全面振兴，惠及十几亿人口，覆盖城乡，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促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发展和党的建设，注重关联性、整体性，实现协同推进。

第四，二者施策谋划有别。脱贫攻坚注重微观施策，最大特色在于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五个一批”和“六个精准”是最集中的体现。脱贫攻坚强调从每一位贫困群众的致贫原因出发，制定差别化、倾斜性的支持政策，实现因人、因地、因贫困原因、因贫困类型施策，下足绣花功夫，实施靶向治疗。乡村振兴战略注重整体谋划，更多地强调农业农村区域协同发展，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突出抓好规划的引领作用，在尽力而为的前提下，更多地强调量力而行，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持续性政策和投入，统筹推进农业农村各项事业发展。

第五，二者问题重心有别。脱贫攻坚主要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确保贫困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虽然对于贫困群众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也有明确要求，但是增加收入仍是第一位的。乡村振兴还将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全面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和社会保障水平，解决多维度贫困问题。随着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乡村振兴战略对于统筹城乡贫困治理的作用将逐步显现。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怎样有效衔接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要有机地从“脱贫攻坚”过渡到“乡村振兴”，从“两不愁三保障”过渡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第一，构建产业体系，实现从产业扶贫到产业振兴转变，为乡村振兴打牢基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基础在于产业振兴，产业振兴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人口长效机制的“牛鼻子”，为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奠定经济基础。以产业发展为重点，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提升市场竞争力，作长链条，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多元化有机衔接。

第二，培育人才队伍，实现扶贫“尖兵”到人才振兴转变。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之一在于人的振兴、人才的振兴。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培育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是根本办法。在脱贫攻坚中，把扶贫与扶志、扶贫与扶智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培育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是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举。扶志扶智可以通过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实用技能培训等，以精神激励人、以智力带动人，贫困群众有了“我要脱贫”的强烈意愿和“我能脱贫”的发展能力；乡村振兴中既需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担当、特别能奉献”的优秀干部继续发挥“带头人”和“突击队”示范引领作用，更需要通过“内育”和“外引”，培养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农民、新企业家、新技术专家。

第三，建设文明乡风，实现从文化扶贫到文化振兴转变。文化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具有引领作用。文化振兴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采取符合农村、农民特点的有效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一方面应充分发挥线上与线下两个平台作用，用科学的理论教育农民、武装农民。另一方面应整理乡规民约、族谱家训等道德资源，充分发挥村民身边先进典型的示范效应，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引导村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深入推进乡村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村民品德建设。

第四，培育生态农业，实现从生态扶贫到生态振兴转变，以生态固本实现生态宜居。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环境衔接在于生态振兴，要立足农村的生态优势，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生态振兴，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绿色发展理念，以生态振兴促进宜业、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促进生态扶贫与生态振兴有效衔接。通过生态振兴，创新发展思路，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具体路径，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目标。

第五，完善乡村治理，为乡村振兴提供治理有效的组织保障。党的领导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石和保障，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不走的工作队”，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是乡村振兴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因此，要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把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行动、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使他们凝心聚力投身乡村经济社会建设中。

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最近，国内外都有一些议论，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已经降至7.5%以下，为什么不采取强制刺激措施？等等。我想，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去年，中央作出一个判断，即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今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三期叠加”进一步作了分析，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久前，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我概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这里，我想用对比的方法，谈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几个趋势性变化。

第一，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消费是一浪接一浪地增长。现在，“羊群效应”没有了，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费拉开档次，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供给体系进行一些调整是必然的，但我国有13亿多人，总体消费水平还不高、余地还很大。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第二，从投资需求看，过去，投资需求空间巨大，只要有钱敢干，投资都有回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我国总储蓄率仍然较高。我们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只要有成本优势，出口就能扩大，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多少年打拼出来的国际市场也是重要资源。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正在向收支基本平衡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积极影响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的产能已近峰值，房地产出现结构性、区域性过剩，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总面积超出实际需要。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互联网技术加快发展，创新方式层出不穷，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劳动力和农业富余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在许多领域我国科技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能够拉动经济上水平的关键技术人家不给了，这就使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随着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竞争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消费者更加注重品质和个性化，竞争必须把握市场潜在需求，通过供给创新满足需求。企业依赖税收和土地等优惠政策形成竞争优势、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为市场充分竞争创造良好条件。

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可以放开手脚大开发、快发展。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难以承载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了。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

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风险。现在，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等领域风险正在显露，就业也存在结构性风险。这些风险，有的来自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行为越位，有的来自市场主体在经济繁荣时的盲目投资，有的来自缺乏长远考虑而过度承诺，有的则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有直接关系。综合判断，我们面临的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通过延长处理时间减少一次性风险冲击力度，如果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威胁，就要果断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方法进行处理。

第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过去，总需求增长潜在空间大，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就能有效刺激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很清楚，产业政策只要按照“雁行理论”效仿先行国家就能形成产业比较优势。现在，从需求方面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从供给方面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适度干预但不盲目，必要时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坚定出手，平衡好增强活力和创造环境的关系，真正形成市场和政府合理分工、推动发展新模式。

以上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在“三期叠加”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但也不会无限下滑；经济结构调整是痛苦的，却是不得不过的关口；前期政策消化是必需的，但可以通过有效引导减缓消化过程中各类风险的影响。这也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这些趋势性变化，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态的内在动因，有的可能进一步强化，有的则可能发生变化。

总起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否则很难与时俱进抓好经济工作。

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大家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认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仍然想着过去的粗放型高速发展，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就跟不上形势了。用老的办法，即使暂时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会持久，相反会使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是总爆发。

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我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同时，我也反复强调，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我说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既包括对正确开展经济工作的要求，也包括正确判断经济形势的要求。不是经济发展速度高一点，形势就“好得很”，也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一点，形势就“糟得很”。经济发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经济不波动不

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只要波动在合理范围内，就要持平常心，不要大惊小怪，更何况我们具有宏观调控的主动性。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但也不能过了头，不要杞人忧天。

必须明确，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对发展条件的变化，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深入认识、全面认识，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做到这些，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破解发展难题的力度，因此必须勇于推进改革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转换经济发展动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如何看待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一、我国当前的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1.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城镇居民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农村居民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明显下降

2 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先沿海、后内地层次推进的战略，东部沿海享受各种特殊的优惠政策，这些客观上都起到了扩大东西部经济和收入差距的作用。

3 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目前，前十位的高收入行业中，除计算机服务业外，都是垄断行业。垄断性质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分别是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工资的 2.5 倍。

4 我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

基尼系数是世界公认的用来衡量社会收入差距的基本指标。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 0.4 的警戒线。

二、收入差距的成因

1. 政策性原因

(1) 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并通过“两富”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我国率先在基础较好且具有开放区位优势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得东南沿海聚集了国内外大量资本，从而加速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地区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2) “按要素分配”的原则。由于人们实际拥有生产要素数量的多少及其价格高低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收入分配状况的高低悬殊，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2. 制度性原因

(1) 税收调节乏力。对个人收入最具有调节效力的是个人所得税，但从我国现行的税种结构来看，由于个人所得税不占主导地位，公民个人纳税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个人收入特别是无形收入难以查实，使得个人所得税在收入调节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

(2)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时间短、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致使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保障力不从心，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

(3) 分配制度不规范。我们在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分配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失控状态，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

3. 体制性原因

(1) 竞争机会的不均等。由于我国历史和传统体制形成的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在竞争起点上就已经存在一定的差距

(2) 行业的垄断性经营。我国直到现在，有些行业如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铁路仍未实行市场准入，处于垄断经营地位，也促使了不同行业之间人们收入差距的拉大。

(3) 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地方保护、地区封锁不仅与建立统一大市场的要求不相容，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收入的差距。

4 非法性原因：“灰色经济”“黑色经济”“腐败经济”，这些都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

三、调整收入差距的对策总的原则

“保障最低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1 加快经济转型步伐，尽快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化的收入分配机制

2 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3 完善税收制度，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我国要发挥个人所得税对收入的调节作用，还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所得税制，合理确定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累进税率。二是完善存款实名制。三是增强公民个人的纳税意识。四是加强征管，以此来加大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 4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公民的基本生活

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比较严重，需要国家把调节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摆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and 经济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有些发展中国家在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济往往长期停滞不前，总在人均GDP 4 000~5 000 美元上下徘徊。因此，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 年）》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 Income Trap）概念。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有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长期停留于中等收入阶段，原有的发展方式中的矛盾积存已久，终于爆发出来了，原有的发展优势渐渐消失了，它们迟迟不能越过人均GDP12000美元这道门槛，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例如，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根廷、智利，都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据世界银行的专家分析，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遇到了以下困难：

第一，由于国内工资收入水平上升，这些国家无法同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竞争，某些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出口竞争中，比中等收入国家生产的同类商品具有优势，在吸引外资方面也更有吸引力。

第二，由于这些国家缺乏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优势产业、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产品，它们的困难加大了，它们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机会几乎没有了。

第三，这些国家已经丧失当初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挺进时的那种艰苦拼搏的精神和斗志。一般民众开始更多地追求福利社会的成果，总希望政府把更多的资源用来实现福利社会的各种目标，否则就对政府不满，于是胃口越来越大，难以自拔。一般民众不了解福利社会主要在高收入阶段才能逐步实现。

第四，这些国家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盛行。人们亲眼看到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滥用职权牟取私利等情况，他们的信心大大下降，官民矛盾激化，引发社会动乱。他们或者移民国外，或者消沉、失望甚至绝望，他们不再像当初创业阶段那样致力于经济振兴了。一般民众的消极、颓废、失望、绝望情绪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又一致命伤。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样出现的。在这里，不妨再做进一步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包括了三个“陷阱”，即“发展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和“技术陷阱”。

下面，分别对这三个“陷阱”做些探讨。

• 发展制度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一个“陷阱”是“发展制度陷阱”，要靠深化改革来避免。已经或正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从传统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在它们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不一定经历了传统制度的激烈变革阶段，从而可能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社会的特征，传统势力和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仍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些特征和势力往往在农村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山区、边缘地区表现得相当顽强，它们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的制度障碍”，也就是“发展的制度陷阱”。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土地制度依旧保留着工业化以前的状况。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表现：

一是传统的社会组织把持着土地，让土地的氏族共有性质长期不变，实际上农村的土地仍掌握在最有势力的氏族和家族长者手中，农村和农业尚未受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影响。

二是农村和农业已经受到市场化的影响，农村中所发生的土地关系变化，表现为一些有势力的家族对土地的占有，从而形成了大地主制度或新建的种植园制度。大地主通常采取租佃制生产，佃户没有地产，沦为失地的阶级，而成为新建种植园的劳动者或者是雇工，雇工没有土地，他们靠微薄的工资为生；或靠在种植园内领得一小块土地，自行耕种，作为工资的替代品。

三是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经历过初步土地制度改革，农民曾分得一小块土地，但在市场经济中，农民中间发生了两极分化，土地兼并加紧进行，有些农民因种种原因，渐渐失去了土地，又成为无地的农民。

无论哪一种情况，土地分配的不均和贫富差距的增大都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制度障碍”或“发展的制度陷阱”。

除了土地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以外，“发展的制度障碍”或“发展的制度陷阱”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传统组织和氏族、家族势力根深蒂固，阻碍了市场化的继续推行，地方政权大多数受到这些势力的操纵，成为大地主主人或种植园主人的工具，地方政府官员成为大地主主人或种植园主人的代理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广大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难以建立。

第二，这些国家中，传统社会的限制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的收入增长率大大低于城市的收入增长率。农村购买力普遍低下，造成内需不足，限制了工业化的继续推行，市场化步伐相应地受到严重限制。第三，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有财政的支持。然而在这些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受阻，财政通常十分困难，只能靠增税来维持，而财政收支经常有巨大缺口，财政赤字无法弥补，结果形成了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率低下交替的恶性循环。

第四，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有金融的支持。然而在这些国家，金融业的发展通常是畸形的：一面是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没有出路；另一方面是资本严重不足，高利贷盛行。造成这种畸形金融状况的制度障碍主要是金融机构或者被外资控制，或者被官僚和权贵们控制，民间金融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第五，在这些国家，发展的制度障碍还在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被严重阻塞了。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常比社会水平流动渠道更重要。这是因为，如果存在着居民迁移受限制的户籍制度。农村或集镇的居民不能自由迁往城市居住并在那里就业，其后果主要反映为城市生活环境恶化，出现贫民窟或棚户区，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等情况。如果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畅，则可以调动低收入家庭成员努力学习和工作，以及自行创业、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反之，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严重阻塞，将会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产生消极的影响。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严重阻塞，主要是制度性的问题，往往和垄断的存在、利益集团势力强大，以及社会上种族歧视、身份歧视、宗教与文化歧视、性别歧视等有密切关系。

如何克服发展的制度障碍？如何避免落入“发展的制度陷阱”？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唯有通过“补课”，也就是改革传统体制，才有出路。这里包括对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从制度上消除各种歧视。

然而，深化改革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阻力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改革拖得越久，利益集团的力量就扩张得越来越广，改革所付出的代价也会越来越大。

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制度改革为例。如果在工业化开始前，或者在工业化刚开始时，对传统的土地关系就进行调整，使“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得以基本实现，同时采取立法措施保护农民财产，限制以强凌弱式的土地兼并，也许后来就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发展的制度陷阱”。如果在

发展之初，采取土地赎买政策，让拥有大地产或大种植园的地主取得土地赎金而转投于工商业，后来的土地重新分配方案也不至于遇到那么大的阻力。然而，改革的最佳时机一旦错过，以后再改革就会困难得多。

何况，以后要深化改革，谁来主持这场改革？单靠少数有正义感、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力不从心，不可能实现这项任务，在激烈的政局动荡中，他们会很快被排挤掉，或者被逮捕、被流放国外，或者被杀害。如果单靠下层社会的穷人，特别是贫困农民来从事改革的深化，很可能酿成暴乱，实行极端的“均贫富”政策，甚至演变为一场内战，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只能使局势越演越乱。

这就是这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的深刻教训。

• 社会危机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二个“陷阱”是“社会危机陷阱”，要靠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社会管理创新来避免。“社会危机陷阱”是怎样形成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贫富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和缺乏社会管理创新所造成的。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业压力始终是存在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村的青壮年，包括农村妇女在内，走出农村寻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早离开农村在城镇中找到工作的人生活得到改善，会有示范效应，会吸引更多的农村中青壮年男女向往城镇，不断走出农村，结果是求职人数超过城镇的就业岗位数，就业成为城镇不得不面临的巨大压力。

同样的道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需求增大，财政支出增大，便有了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土地、原材料燃料供给紧张，房地产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又有了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加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同国际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它们越来越卷入全球化的浪潮，所以无论从商品流通渠道看，还是从资本流通渠道看，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多种形式的通货膨胀相继发生，使发展中国家国内民怨沸腾，使公众不断增大对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对政府的不满，对执政党的不满。

还应当注意到，如果发生的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或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那就会同失业交织在一起，形成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滞胀”。“滞胀”必将使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受到打击，状况恶化，更重要的是使失业者和低收入家庭愤怒、绝望，“社会危机陷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

“社会危机陷阱”的出现，造成社会动荡加剧，农村更加穷困，城市贫困人口增多，失业者增多，经济增长因城乡居民购买力下降而无法实现，因此政局会发生急剧变化，街头政治活跃起来，激进分子煽动大众起来推翻政府，并提出极端的政治主张。有钱人家相继移居国外。这时，任何想改革和发展的政治家都感到束手无策，不知从何着手。这些发展中国家只得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无法自拔。

就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而言，要迈出“社会危机陷阱”，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然而，在“发展的制度障碍”刚出现时，尽管改革的困难已经比经济发展初期大很多，但只要政府的决心大、魄力大，仍有可能推进，而到了“社会危机陷阱”出现后，改革的难度就更大了。在“社会危机”影响下，政局已很不安定，再谈“改革中发展”或“发展中改革”，都使得政治家不知所措，通常转而以“自保”为第一目标。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那些土地关系严重有缺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对现有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但无论是住在农村的还是住在城里的大地主家族或大种植园主利益集团，全都反对土地改革，甚至连妥协的、折中的土地改革方案也反对。这是发生“社会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最难解决的问题。

要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一定要从解决三个问题着手，一是增加贫困地区的就业机会，二是改善贫困地区的投资条件和发展条件，三是向贫困地区输入资本。但这三个问题都不容易解决。要增加贫困地区的就业机会，就必须增加投资；要改善贫困地区的投资条件和发展条件，同样必须增加投资。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为了保证贫困地区各项改革措施能有效地推进，能维持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保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管理工作应有所改变。这通常是指在贫困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和失业人数较多的城镇，推行农村和城镇社区的居民自治，采取各种化解民间矛盾尤其是地方贫富隔阂、官民隔阂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措施。对于民间的突发事件，要采取应对预案，早做准备，早做疏导，早进行化解。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对民间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很容易发生大的骚动，最后加深社会矛盾，甚至激发更大的社会冲突。加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往往同当地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氏族或家族矛盾、地方派系矛盾纠缠在一起。因此，民间酿成的社会冲突必须在刚开始时采取适当的对策，及早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就显得格外重要。

• 技术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三个“陷阱”是“技术陷阱”，要靠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创新来解决。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经济停滞，摆脱不了困境，同技术上难以有重大突破有关，虽然它们认识到，如果技术上没有重大突破，缺少自主创新，缺少产业升级，缺乏技术先进的优势产业，人均GDP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与高收入阶段之间的门槛。然而，在这方面，它们往往无能为力。为什么？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创新必须同资本市场创新结合。如果缺少这种结合，这些发展中国家，即使已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要想在尖端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技术陷阱”。

要知道，技术上要有重大突破，必须有尖端的科研和技术人才，而在不少发展中国家，高端人才是远远不足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是由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严重阻塞，通常缺乏鼓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所以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被埋没了，受压制了。二是由于工资待遇、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和工作环境的影响，不少在国外学有所成的人才不愿回国工作，而愿意受聘于国外，留在国外长期不回。三是本国培养的人才也受到国外机构的吸引，不断流向国外。这样，高端人才的严重不足是很自然的。简单地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再加上金融专业人才短缺，金融监督松弛，腐败丛生，投资者望而生畏，把创业投资视为畏途。

这些国家的富人尽管拥有较多的财富，但从来都把不动产的持有看作是首要目标。即使从事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也一直把采矿业、建筑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重点，很少涉及风险较大和自身又不存在优势的先进设备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投资并无把握。在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从来都要依靠较完善、较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来为技术创新的开展与推广进行融资。然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如上所述，既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由于富人作为投资主体不愿涉及风险较大的行业，所以不仅资本市场发展不起来，而且高端技术、自主创新、新兴产业也难以取得重大进展。富人作为投资者，太急功近利了，只想迅速获得暴利。如果股市看涨，他们常常带着投机的想法，大量涌入，徒然增加资产泡沫；一旦股市看跌，他们又匆匆撤离资本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发展中国家一直缺乏有战略眼光的、有志于振兴民族经济的企业家。另一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几乎从不关心改善资本市场的现状，使得先天不足，后天又缺少对资本市场的关心和扶植，使资本市场未能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并不久。在中等收入阶段继续前进时，中国会不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并落入其中，这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希望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虽然是一种愿望，但也只是一种假定，因为这里还有若干假设条件，需要探讨。

假设之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如果遇到“发展的制度障碍”，该怎么对待？是继续推进改革，清除这些制度障碍（例如城乡二元体制、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环境等），还是犹豫不决，不敢或不打算采取有效措施，或者认为这些方面的障碍在现阶段的格局下不可能阻碍中国经济的继续前进？只有采取第一种对策，下定决心，大力推进相关的改革，才可以跨越“发展的制度障碍”而不至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假设之二：要对中国现阶段和在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的社会冲突的状况和趋势做出实事求是的估计，要正确对待已经露头的社会不和谐的现象，既不能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也不要惊慌失措。正确认识，正确评价，正确对待，是最重要的。如果认为贫富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等问题确已到了必须正视而不能忽略的程度，那就应当迅速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一一缓解，以增加社会的和谐程度。这样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否则，不是没有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和社会矛盾激化，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假设之三：在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绕不过“技术陷阱”，不能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尖端技术等方面有重大突破，如果资本市场依旧是不完善、不完整的体系，技术创新得不到资本市场有力支撑，那么即使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在高收入阶段仍会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的高收入阶段。这可能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发挥在促进技术创新中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产品能以“中国制造”开拓国际市场是必要的，今后仍应继续在“中国制造”方面努力，不能丢掉“中国制造”的成果。但中国又不能以“中国制造”为限，而应当努力在某些关键性行业和产品上以“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

假设之四：中国必须摆脱过去长时期内支撑经济增长率的旧模式，也就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的旧模式。中国应当摆脱过多依赖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旧模式，转向投资与消费并重的拉动增长的模式，再进而实现以消费需求带动增长为主、投资需求带动增长为辅的拉动增长的模式。这样才会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才能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避免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出现，也才能避免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否则，即使中国过几年人均GDP超过了10 000美元，仍不能认为中国走上了稳定、健康增长的道路。

假设之五：中国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能够在发展中取得这样显著的成绩，全依靠改革开放以来调动了民间的积极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迅速成长壮大了。如果今后循着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致力于发展民营经济，培养一批又一批有战略眼光的、有志振兴民营经济的企业家，中国一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反之，如果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到此为止了，民营经济将受到抑制，民间积极性将受到挫伤，这不仅会阻碍我国经济的继续成长，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突出的是会发生失业、贫困地区返贫、社会动荡激化等问题，这样，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也将成为事实。

如何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深刻内涵？

一、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三个维度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从三个维度理解：第一个维度是物质的现代化；第二个维度是治理的现代化，也可以说是制度的现代化；第三个维度是人的现代化，即更大程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中，人的现代化是物质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物质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各有其侧重点的。例如过去在物质短缺的情况下，我们更多强调的是物质的现代化。20世纪60年代我们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着重讲的是物质的现代化。

进入21世纪，“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在物质的现代化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之后，我们就要及时跟进制度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2.治理（制度）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着眼点从物质的现代化开始过渡到制度的现代化。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并作出重要部署。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物质的现代化也将难以进一步取得新的进展。有了制度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来支撑，物质的现代化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3.人的现代化

近年来，我们党开始关注“人的现代化”，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意味着不能再单纯依靠自然资源、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发展，而是要更多地依靠创新。要从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让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发挥更大作用。要通过人自身的发展，通过国民素质（包括健康素质、文化素质、技能素质等方面）的普遍提升，给“创新”打下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使发展的方式和目的高度统一。

二、新的发展原理：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

注重人的现代化，意味着要用新的发展原理来指导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这个新的发展原理是人本逻辑，这与传统发展经济学讲的资本逻辑有明显区别。在物质短缺、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下，需要重视资本逻辑，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要避免资本逻辑导致人的异化，避免财富鸿沟、人力鸿沟，避免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

我们要避免这种资本逻辑带来的发展畸形，就必须转向人本逻辑，即通过人自身的发展来实现整个国家的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所以在三个维度的现代化里面，人的现代化应是居于中心地位，物质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都要围绕人的现代化来做文章。经济社会的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是要为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创造有利条件，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很多重要论述，例如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这都为人的现代化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要朝人的现代化方向努力，不能厚此薄彼。

以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待遇等方面的不平等，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制度创新去解决；妨碍人的现代化、妨碍人全面发展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也是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从“增长逻辑”转向“发展逻辑”

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还是治理的现代化，最终都要落脚到人的现代化上。同时，人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物质的现代化和治理的现代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要摆脱原有的那种只从物质现代化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偏向。这意味着我们要从过去的“增长逻辑”转向“发展逻辑”。

增长逻辑是单一维度的，主要是讲GDP的体量、规模、速度。发展逻辑不仅要讲规模、速度，还要讲质量、结构、效益、安全；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完善，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作为目标，物质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就会失去方向。

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即六个“新”：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这些目标中，“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主要讲的是物质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讲的是制度的现代化。“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与治理、制度的现代化有关，因为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完善。而“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关注的都是人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也可以从人的现代化角度去理解。因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同时也是人自身全面发展、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可以说，“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六个方面的目标，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阶段性目标，都是围绕着物质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而展开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就业新特点和就业优先战略新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就业工作佳绩连连，就业局面稳定向好。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这一成绩凸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执政为民的理念，体现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就业政策的良好效果。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增长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与此同时就业形势更加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实践证明，就业是经济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手段。就业工作搞好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就能不断提高，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稳定，经济增长也会获得更为强劲的动力。

就业新格局新特点逐步显现

就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就业作为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将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就业，取得了显著成就。过去5年，城镇新增就业每年都超过1200万，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4%左右，接近充分就业的目标。总体来看，我国就业形势在稳中向好的同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新特点，逐步形成了新格局。

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能力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服务业发展。2012年，服务业首次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据半壁江山，占国民经济比重达51.6%。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进入新阶段，服务业主导的特征愈发明显。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使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与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相比，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更强，具有“就业友好”的特征。按照2015年不变价计算，2016年第三产业每100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为9.1人，比第二产业高1.6人。2012—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平均吸纳非农就业172万人，比2009—2011年多吸纳30万人。初步测算，2016年经济增量对应的就业比2015年增加182万人。这意味着，过去需要较高增速吸纳的就业数量，现在以相对较低的增速就可以吸纳。正因为如此，高增速已经不是经济增长的优先项，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经济增长才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已基本同步甚至高出经济增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快速增长，就业规模持续扩大。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过去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劳动生产率稳步提升，居民收入也保持较快增长。2012—2016年，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从7.67亿人增长到7.76亿人，年均增长0.3%；城镇就业规模从3.71亿人增长到4.14亿人，年均增长2.9%；全员劳动生产率（国内生产总值与全部就业人员的比率）从72817元/人提高到94825元/人，年均名义增长7.6%；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10元提高到23821元，年均名义增长11.1%，扣除物价影响后，年均实际增长8%左右，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这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已基本同步甚至高出经济增速。这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正在惠及全体劳动者，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高。

新经济蓬勃发展，就业渠道更宽。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动能转换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既有传统动能，也有新动能。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以“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掀起了一轮创新创业的热潮，不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动力，而且创造了大量新职业新岗位。2016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1651万户，较2012年的945.8万户增长74.6%，比上年增长11.6%。其中，新登记企业553万户，较2012年的250万户大幅增长1.2倍，比2015年增长24.5%；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5万户，全年新登记企业创造就业超千万。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正在渗入各行各业。2016年网上零售额较上年大幅增长26.2%，比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幅高出15.8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估算，在2016年增加的全部就业中，新经济的贡献率达到70%左右。

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劳动者就业质量全面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加快，劳动者就业和社会保险各项权益得到有效保障。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劳动关系进一步规范，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连续几年保持在90%以上；二是工资水平大幅提升，过去5年全国平均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幅达到10%左右；三是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2016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3.79亿人、2.95亿人、1.81亿人、2.19亿人和1.84亿人，较2012年末分别增长24.6%、11.6%、18.8%、15.2%和19.4%；四是农民工超时劳动情况明显改善，2016年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个月，月均工作时间减少到24.9天，

日均工作时间减少到8.5个小时。国际上一般用工薪劳动者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就业质量。按照这一计算方法，2012年我国这一比例为54%，2015年提高到63%，3年增加9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正在得到全面提升。

就业优先战略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拓展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就业的总量性矛盾有所缓解。但面对国内经济增速换挡和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的局面，我国就业工作面临的挑战依然较大。这其中既有劳动力市场传统的结构性矛盾，如农民工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存在、劳动者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等，也有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出现的新问题，如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下岗分流人员、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造成企业用工需求下降等。过去5年，我国在有效应对这些就业难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拓展就业优先战略的内涵。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习近平同志指出，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发力抓好就业工作，为就业优先战略注入新内涵，将促进就业的目标融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贯穿在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产业发展规划、公共投资项目等各个环节；同时，既让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加大就业支持力度，统筹推进就业岗位创造和就业质量提高。这些举措有利于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获得财富、实现幸福，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为有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保障。当前，我国正在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去产能的过程也是产业此消彼长、企业优胜劣汰、人员转岗分流的过程。一些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发展起来的行业，由于过度依赖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很多困难。化解这些行业的过剩产能，必然会造成一部分人员失去工作岗位。习近平同志指出，“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会有一些职工下岗，要更加关注就业问题”。在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始终将就业安置放在重要位置，综合运用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各项社会政策，通过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援企稳岗补贴、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转岗就业和扶持创业等多种方式，保持了就业稳定，有效应对了失业风险，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就业形势的总体稳定，为有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更好条件，也丰富了就业优先战略的内涵。

与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相辅相成。就业优先战略的另一个新内涵，是将就业优先战略与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各项举措结合起来，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把稳增长、保就业作为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以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为就业保驾护航。这既有利于破除“速度焦虑”、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质量提高，又有利于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实现就业优先战略目标。比如，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有利于构建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构建适应国际竞争新形势、符合国家发展新要求的现代产业体系，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加快推进去产能、去库存，降低无效供给，减少不稳定、低质量就业，有利于改善就业环境，为更高质量的就业供给腾退空间；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深化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利于优化创业环境、鼓励创新创业，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适应经济结构转变和产业升级需要，加大职业培训投入，完善职业培训机制，有利于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

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就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既是对人民群众期盼的有力回应，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要求我们在不断提高就业数量和质量的同时，实现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就业。当前，尤其需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培育新经济新业态，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不断扩大就业规模、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是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前提和基础。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期，高新技术不断涌现并加速实现产业化。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设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不仅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能够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打开创业就业新领域。与此同时，积极营造更加宽松的体制机制环境，探索和创新适合新经济发展的监管方式，消除新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有利于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快速发展壮大，有利于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此外，适应新经济的就业和用工特点，加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能够让更多劳动者分享新经济的红利。

更好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促进就业公平。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公平就业，是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建立既灵活又安全的劳动力市场，保护好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应加大最低工资制度执行力度，科学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险制度转移接续办法，提高社会保险的可携带性；改革失业登记制度和失业保险政策，让非户籍常住人口能够享受与本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失业保障待遇；完善城镇就业支持体系，根据大学毕业生、农民工、“4050”人员、下岗安置人员等技能特征和失业类型，分类施策开展就业援助；以就业为导向健全社会托底政策，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就业的联动；加强就业监测和形势研判，完善以调查失业率为基础指标的信息系统和预警体系，建立宏观经济政策对就业影响的评估机制。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区域间就业机会的基本平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促进区域间就业机会的基本平衡，因而是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服务还存在差距，应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通过提高城市经济效率、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投资环境等方式，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经济活力和就业吸纳能力；加大对资源枯竭、产业单一、老少边穷等地区的就业支持力度，对于总需求不足、就业机会缺乏的城市，制定有针对性的就业发展战略；加强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培训，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与本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职业培训服务；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引导人口有序合理流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就业机会区域不平衡、就业形势地区分化的矛盾。

创新型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不断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理解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内涵，既要重视科技创新能力，也要跳出科技看科技。

■进一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深化创新驱动，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与经济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新引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力

量，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新时代的科技创新必须进一步强化战略导向、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坚持“三个面向”的战略方向，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源头供给，为应对风险挑战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筑牢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根基。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切实贯彻到科技工作的方方面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对科技创新进行了全局谋划和系统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深邃内涵。

一是深刻理解必须坚持党对科技事业全面领导的论断。健全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提高政治站位，确保科技工作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战略谋划、政策制定、工作推进上始终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来开展。

二是深刻理解科技是国之利器的论断。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驱动作为国策，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三是深刻理解关键核心技术必须自主可控的论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把创新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

四是深刻理解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的论断。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顶尖水平，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夯实基础，储备长远，加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重大科学问题部署，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

五是深刻理解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论断。科技创新不能自我循环、不能停留在象牙塔内，要融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全过程。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打通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

六是深刻理解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论断。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科技创新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七是深刻理解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论断。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要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全面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位势。

八是深刻理解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的论断。牢固树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和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意识，全面系统学习、理解、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对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方法的总结，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转化为推动新时代科技改革发展的具体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现代化事业输送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准确把握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内涵，牢牢抓住科技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明确要求。创新型国家是以科技创新作为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以技术和知识作为国民财富创造的主要源泉，具有强大创新竞争优势的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是接续发展、一脉相承的。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创新发展之路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我们既要注重借鉴国际经验，更要结合自己的优势特点走特色发展之路。理解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内涵，既要重视科技创新能力，也要跳出科技看科技，强调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支撑引领作用。我们理解，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有几个基本标志：一是具有较强科技实力，国家综合创新能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部分领域世界领先；二是形成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建成若干世界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和高水平创新基地，创新主体充满活力，创新链条有机衔接，创新效率大幅提高；三是初步形成创新型经济格局，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初步扭转，若干重点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四是基本形成创新型社会格局，创新成果惠及人民群众，高质量就业快速增加，激励人才创新创业的价值导向和文化氛围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显著增强，主要科技创新指标稳步提升，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影响力和贡献度不断扩大，创新型国家建设迈出坚实步伐。2018年科技创新能力大幅增强，主要科技创新指标稳步提升。全社会R&D支出占GDP比重预计为2.15%。研发人员总量预计达到418万人年，居世界第一。国家综合创新能力列世界第17位。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超过58.5%。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3万家。168个国家高新区预计实现营业收入33万亿元，出口总额3.3万亿元，实际上缴税费1.7万亿元。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为1.78万亿元。

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中既蕴含机遇，也面临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是我们面向未来必须抓住的重大战略机遇。当前，基础前沿领域孕育重大突破，交叉融合态势更加明显，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相互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创新模式向网络化、生态化转变。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脑科学、基因编辑等新技术加速突破，颠覆性创新持续涌现。尽管在开放条件下推进自主创新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我们仍要看到，“危”与“机”并存，变中有忧，忧中有机，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轨道变化，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了难得的赶超“机会窗口”。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始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也要继续扩大科技开放合作，聚四海之力，汇八方之气，为我国科技创新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还很不适应。科技创新还没有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关键核心技术短板突出，创新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偏少，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体制机制和生态环境还有待完善。目前，离2020年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们必须对标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加快冲刺攻坚，努力补齐短板，全力完成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各项重大任务。

加快创新驱动步伐，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强大引擎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成长空间、关键着力点和重要支撑，是促进实体经济升级、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赋能实体经济，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逐步积累。进一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还在于深化创新驱动，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进入新时代，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特别是资源环境、医疗健康、脱贫攻坚等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更为迫切，要求科技创新成果与社会民生改善的实际需要紧密对接，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思路上，科技工作要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围绕支撑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突出“四个更加”。一是更加强化“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强化政府在规划布局和重大任务凝练中的决策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集中力量攻关，近中期解决“卡脖子”问题，长期构建国家先发优势。二是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都要强化原始创新，要加快推进从跟踪型研究向开创型、引领型研究转变，特别是要加强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不断创造和拓展新的优势领域。三是更加注重开放合作，既要坚持关键领域自主可控不动摇，也要坚持开放合作的方向不动摇，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共赢格局。四是更加注重创新生态，既要形成激励全社会创新的氛围，又要加强约束、坚守底线，推动作风学风大转变。

在政策上，要针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优化资源配置进行精准施策。一是围绕人才放权、松绑、激励、服务等，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进一步释放科技人才的活力和创造力。二是把社会资源更多地引导到科技创新上，把人才、项目、基地等创新资源优先配置到解决国家重大需求上，加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投入。三是强化已有政策落实，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加强调研，及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

在重点上，要抓好体现国家战略意图和长远发展需求的重大任务落实。一是完成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编制，谋划好新时代科技发展的战略路径。二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增强企业、产业和区域创新能力，形成对科技创新的全面支撑。三是组织实施好重大科技项目，实现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重大突破，产生更多原创成果。四是牵头组织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重大工程，加大国际引才引智力度，深化与创新大国和关键小国的合作，形成高水平开放创新格局。五是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建设，转变作风学风，加快培育形成良好创新生态。

科技创新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科技工作必须砥砺前行，攻坚克难，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增强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造福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步伐，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学习教育，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

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要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紧密结合起来。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来自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挑战，国家安全环境复杂多变。但目前我国的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都可以让我国有能力、有信心、有经验和有时间去应对这些国家安全问题，最终以较小的成本长远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确保国家形势安全、人民生活安定。

一、中美贸易争端

2019年3月22日中美贸易战开始，其标志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备忘录中指出对中国信息通信技术、机械、航空航天等产品增加25%关税、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并购进行限制、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增加关税、宣布4月16日制裁中兴集团。7月6日特朗

普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340亿美元商品增加25%关税;8月25日特朗普宣称日后不与有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背景的企业往来。针对美国做出的一系列决定,8月3日中国政府决定对美国的600亿美元产品、5207个税目增加5%至25%的关税。尽管中美两国谈判多次,最终由于美国政府缺乏足够诚意而未达成共识。

主要对策:中美贸易战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无法调和的,必将会极大地冲击到世界贸易体制,导致中美关系两败俱伤。目前,我国的优势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美国在中国市场上占有巨大份额,主要集中在汽车、飞机、农产品、手机、电子产品这些方面。第二,中国拥有美国1.2万亿美元的国债。第三,中国拥有其他国家广阔的市场,中国应将贸易战作为中国发展的新机遇和新契机。第四,中国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一直以来,我国始终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其他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但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可能放弃国家利益,更不会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换取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不损害国家的安全、主权、发展利益。

二、台海局势严峻

2016年蔡英文执政台湾后,对“九二共识”始终持不承认的态度,坚持走“台独”路线。蔡英文在太平岛上建立了地下小型军事指挥所,公然挑战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最近台湾还对教科书进行全面修改,推进“去中国化”进程发展。台湾投资大约1万亿新台币发展或引进新型武器装备,相继开展了神鹰、汉光、天马、联字号、雷霆等多次不同规模的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体现出台湾鲜明的以武力拒绝统一的立场。

主要对策:第一,高举法律武器。运用国内法律和国际化法,有利、有理、有节地实现国家统一,力争国际社会的支持和理解。第二,择时宣布武统的底线和时机。如果台湾进行外军进驻、“独立公投”、军事进犯、“宣布独立”、研发核武器、大规模岛内动乱,中国将决定宣布实行武统。第三,周密谋划实行里应外合。对台湾岛上的爱国力量进行整合;对台湾岛上的重要目标和文化古迹进行保护;对台独重要犯罪分子,悬重赏缉拿归案,尤其是主要的台独分裂分子。

三、东北亚局势起伏不定

东北亚的范围包括中国、朝鲜、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蒙古的部分地区。2019年6月1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与特朗普在新加坡会晤。在这以前,朝鲜拆除了位于平安北道的导弹试验设施、炸毁位于丰溪里核试验场,美国朝鲜两国的关系略有改善。后来两国不断发生纠纷,美国未对朝鲜放弃制裁和做出安全承诺,一再催促朝鲜制定放弃核武器的时间表,不断发起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特朗普要求政府推迟了对朝鲜的预定访问时间。

主要对策:中国提倡进行多边安全合作,通过对话的方式维护多边地区和平安全。但因为美国的强势介入,大大削弱了亚太多边机制的协调性和自主性程度,造成地区安全问题更容易脱离健康发展轨道。这些会增加中国在维护共同安全、寻求合作安全方面的成本。

四、内部因素多且复杂

第一,分裂问题。国家统一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途径,分裂独立是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当前,我国国内依旧存在几股分裂势力,如东突势力、台独势力、港独势力等,这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第二,生态问题。长久以来,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侧重于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生态问题还很严峻:未彻底根治好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恶化问题;城市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节能减排任务未彻底完成,引起滞后效应;海洋环境污染导致渔业资源受到危害等。可以说,环境治理工作是一项复杂性长期性工作,我国将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国家绿水青山,给人们生活提供安全绿色环保的生态环境。

第三,民生问题。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加大,消费压力和能源生产显著增加。我国能源消费远远大于能源产量,并且能源消费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如果不快速实施消费革命和能源生产战略,那么会对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造成严重阻碍。未来几年,我国还会面临能源高消耗、高依赖和能源短缺的难题。因此,要大力提倡节约能源意识,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发新能源,利用太阳能、风能、电能等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网络问题。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网民的数量持续增加,据统计,我国当前有6亿网民。网络信息安全在中国国家安全体现中的占比越来越大。网络不安全,国家就不安全,没有信息化支撑就无法实现现代化。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存在三个方面的威胁:一是信息数据存在被窃听的风险。二是国产网络设施、软件设施技术水平有待提升。三是网络风险防控能力不强。我国上网用户的硬件设备多数产自美国,企业、政府和个人信息数据很易被国外监听、窃取。另外,中国用户利用几大社交软件人数超亿,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保护用户个人信息难度增加,如果出现大规模泄露用户数据的情况,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需要不断加强网络法律制度建设,积极促进网络安全向法制化轨道发展。

香港极端势力的表现、影响与原因

当前,香港街头的暴力乱象引起广泛关注,极端势力的行为早已越过底线,对香港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巨大。回溯香港过去十年,香港极端势力发展迅速。2010年,在香港“泛民主派”的支持下,香港极端势力主要诉求为“反中国”与“反大陆”,此为崛起阶段;2013年香港极端势力推出“香港城邦论”,此为发展阶段;2019年香港极端势力公然辱国,进入高潮阶段。香港极端势力与建制派完全对立,受到“泛民主派”理念的影响,但比部分“泛民主派”极端,已成为香港近十年来诸多乱象的主要影响因素。

香港极端势力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对“一国两制”原则持明确的排斥态度。香港极端势力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反华”“反共”等口号与诉求,而是思考香港的长远规划,为使香港彻底摆脱中国而寻找理论依据。极端势力不仅反对“一国”大原则,还企图日益扩大“两制”之间的距离。2015年前后香港各种“本土论”出台,呼吁香港永续自治,提出“香港城邦论”和“香港民族论”,甚至号召国际势力联合“拒中抗共”,这些观点在香港反对派媒体的宣传下广为传播,影响甚远。二是运用激进手段推动社会运动。2011年成立的激进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于2012年发起大规模社会运动,逼迫特区政府取消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计划。2014年的占中运动中,“学民思潮”再次发挥了主要作用。2016年大年初一,激进分子甚至利用暴力手段发动旺角暴乱。到2019年,香港极端分子的行为可谓“超越”历史。首先是香港反对派阻止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进而极端分子冲击和打砸特区立法会大楼,之后发展到围堵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大楼,并涂污国徽、喷涂侮辱国家与民族的字句。

香港极端势力的行为造成三大影响。首先,极端势力严重挑衅“一国”底线。“一国”原则需要在两个方面得到尊重。一是国家的主权地位不能受到挑战,国徽是主权国家的庄严标志,必须得到尊重。二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不能受到挑战。“一国”原则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应该得到尊重,但香港极端势力既不认同也不尊重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次,香港极端势力的行为不仅会进一步撕裂香港社会,也会伤害大陆与香港之间的感情。香港回归之初,香港建制派与“泛民主派”的对立并不严重,二者之间仍然具有理性讨论的空间。但香港极端势力崛起后,通过操弄诸种议题,

香港社会内部对立情绪加重，香港与大陆之间自然也产生了一些对立情绪。再次，香港极端势力也对香港法治带来巨大危害。法治是香港资本主义赖以持续发展和香港社会持续稳定的基础，极端势力通过吸引大量年轻人参加街头暴力活动，正日益将香港引入失控的危险境地。

可以说，香港极端势力的行为是部分港人对香港“优越感”丧失的焦虑与极端反应。回归前，香港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员，中国大陆还在为加入世贸组织而奋斗，香港自然有一种经济上的优越感。回归后，随着大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香港优势逐渐丧失，部分港人内心失落，他们又从价值观上寻求对大陆的“优越感”，认为香港社会的自由、法治优于大陆。在各种“优越感”的背后，部分港人长期以来一直追求一个目标：要将香港建成大陆的样板。这一目标本无非议之处，但香港回归后，部分港人越走越偏，他们否定特区政府提出的涉及香港政改和法制的议题，甚至与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对抗。但是，香港也要正视现实。部分极端势力所利用的这些“优越感”在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必定会逐渐丧失。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只会更加国际化，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背景下，香港必定会融入国家整合的潮流。大陆才是香港所倚，国家才是香港所依，香港要保持任何优势和持久发展，只有在大陆和国家的支持下，才具有现实意义。

香港极端势力的行为也是部分港人对英美势力的幻想所致。尤其是最近英国新首相上台，不排除美英联手的可能。英国政府在香港回归之后，多次就香港事务发表意见，也多次接待香港反对派人物。但是，英国的任何所谓“支持”都是没有法理依据的。香港回归后，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远超英国。美国早在回归前的1992年就制定了《美国——香港政策法》，承诺美国将在回归后依然维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并以此为条件压制中国政府，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遵守“一国两制”，美国将根据该法，废除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部分港人自以为这是香港维持独特性的国际支持，因此恣意妄为，不惜撕裂香港社会，不惜伤害国家与大陆同胞的感情。但是他们忽视了一点：美国已经将香港视为一枚对付中国的棋子。在近年来美国对华施压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各种支持香港极端势力的言论无异于乱港毒药。美国的算盘无非是两种：一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香港极端势力继续乱下去，中国政府会担心美国不再给予香港特殊地位而不敢对香港极端势力动手，这样香港极端势力和“反对派”将逐渐坐大，最终主导香港并走上与中央对抗的道路；二是当香港极端势力乱到无法收拾，中央政府不会坐视不管，必定会出手。到那时，中国政府就会被国际反华势力指责破坏“一国两制”，而美国或许也将不再给予香港特殊地位，这样香港经济可能发生震荡，但这不会对香港造成持久影响。无论哪一种算盘，香港仅仅是美国的棋子而已，其后果的利与弊，香港人民须自明。

美丽中国应该如何建设？

基本方略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具体路径是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珍惜每一寸国土，尽可能集中集约利用国土空间，减少对自然生态空间的占用。要按照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的要求，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要大幅提高生产绿色化程度，改变过去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换取物质财富的老路，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要以绿色消费、低碳消费、适度消费为主满足消费需求，尽量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有负面影响的生活行为。

重点任务是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推进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础，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长远大计，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体制保障。这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今后5年建设美丽中国的重点任务，完成好这些任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十三五”时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哪些决定性成就？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建议》对决定性成就作了盘点和总结。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这主要是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角度来总结的。“十三五”时期，我们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发力、蹄疾步稳，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加强、全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力度不减、纵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根本动力、制度保障和政治保证。

第二，“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预计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元”。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主要的标志。2020年虽然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但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实现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完全能够实现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三，“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既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质量和成色，也决定着全面小康能否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党中央及时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继续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狠抓政策落实，对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实施挂牌督战，因地制宜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和扶贫产业恢复生产，有力推动扶贫项目开工复工，有效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

第四，“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十三五”时期，我们党和国家始终把“三农”问题摆在首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有力确保了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牢牢端在中国人手上、饭碗里始终装着中国自己生产的粮食。

第五，“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十三五”时期，党和国家一以贯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制度、最有力的举措，持续以水、大气、土壤污染治理为重点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全球生态治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六，“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十三五”时期，党和国家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为突破口，推动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新机遇、提供了新动力。